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目： 在世界革命与国家利益之间：
中国与巴西关系研究（1949-1974）

姓 名： Tomaz Mefano Fares

学 号： 1401214925

院 系： 历史学系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现代中外关系史

导师姓名： 王元周 教授

二〇一七 年 六 月

版权声明

任何收存和保管本论文各种版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本论文作者同意，不得将本论文转借他人，亦不得随意复制、抄录、拍照或以任何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一股新风。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巴西共产党提出了更激进的纲领，即争取大众的支持，领导农民为土地改革而进行武装斗争。但不久巴共又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转而开始推行阶级合作政策，支持民粹主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巴西共产党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反而更符合中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因为中国共产党相信第三世界国家是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因此认为无论第三世界国家是什么社会制度，中国都应该争取这些国家的政治支持。为此，中共推动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促进中巴两国人民的交往，强化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

中巴民间外交对巴西民粹主义政府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巴西政府逐渐加深同中国的联系，但是尚未发展成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巴西对美国的依存度很高，所以当巴西政府开始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时，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政变以后，中巴之间官方往来几乎断绝，只剩下政党之间仍继续保持联系。

然而中苏交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对中巴关系产生作用。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巴西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支持中国的组织，并受到中国的支持。在 60 年代中期，中国曾向这些组织提供援助，尤其是在政治培训方面。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又开始设法争取巴西等拉美国家政府的支持，而停止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援助，中巴外交关系正式建立，而中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随之结束。

关键词：中国 巴西 巴西共产主义运动 中巴关系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Study of China–Brazil Relations (1949-1974)

Tomaz Mefano Fares (Master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Directed by Professor Wang Yuanzhou.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rought a new spectrum t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Brazil. At the utmost of the Cold War,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engaged in a more radical program, supporting the mass movement, and encouraging armed struggles for agrarian reform. However, shortly after,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hanges, the Communist Party started corroborating with a policy of class conciliation, supporting the proj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couraged by Brazilian populist governments.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of class conciliation was aligned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Brazi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idered Third World Countries as a territory between the socialist ground and the capitalist ground, in a way that whatever social system it belonged to, China should support it.

Ther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moted “civil diplomacy” (*minjian waijiao*), “using citizens to press the officials” (*yimin cuguan*), increasing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and intensifying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Civil diplomacy was appealing to the Brazilian populist government, and during the 1950s and 60s, Brazil gradually grew ties with China. However, it was not enough to develop a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 When China and Brazil started to straighten official relations, Brazil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 Brazilian army then, a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 coup d'état. After the coup, the offici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were almost extinguished, leaving only the link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Nevertheless, the influence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ffected China-Brazil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part of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movement began to indentify itself with Maoism and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emerged supporting China. On the mid-sixties, China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se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regarding to political training. But with the resump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China had started to seek support from Brazil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and therefore, stopped the assistance given to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then, Sino-Brazil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have been formally established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have come to an end.

Keywords: China, Brazil, Brazilian communist movement, China–Brazil relations

目 录

导论	1
一、研究的问题	1
二、研究思路	1
三、研究综述	2
四、依据的史料	3
五、主要内容	4
第一章 中国新政权与巴西共产运动（1949-1954）	6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巴西的反应	6
一、中共与拉美	6
二、巴共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反应	7
三、巴西政府的反应	10
第二节 朝鲜战争爆发后政党关系的发展	11
一、中美在拉美的外交角力	11
二、政党关系的发展	12
第二章 中巴关系的发展与巴共的配合（1954-1959）	14
第一节 中国与巴西政府的接近	14
一、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新战略	14
二、中巴贸易的发展	17
三、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19
第二节 巴共的政策转变与中国的态度	22
一、巴西民粹主义政府的工业化与巴共的政策转变	22
二、中共对巴共政策转变的回应	22
三、民粹主义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挑战	26
第三章 中国与中共对巴西的双重外交（1959-1964）	29
第一节 巴共的分裂及新巴共与中国的关系	29
一、巴共的分裂	29
二、新巴共与中国	29
三、巴西左翼组织与中国	31
第二节 中苏分裂与古巴革命的影响	33
一、中苏分裂的影响	33
二、古巴革命的影响	34

第三节 官方关系的发展与民间交往的改善	36
一、官方关系的发展	36
二、民间交往的改善	39
三、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干涉	41
四、中国的双重外交	43
第四章 中国对巴西外交的激进化（1964-1969）	45
第一节 巴西政变与中巴关系	45
一、巴西政变的影响	45
二、“九人事件”	46
第二节 中国对巴西外交政策的转变	48
一、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48
二、中共对巴西共产运动的影响	49
三、巴西的毛泽东思想组织	55
第五章 中巴建交与政党关系的结束（1969-1974）	58
第一节 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巴建交	58
一、中巴关系的改善	58
二、中巴建交	59
第二节 中共与阿拉瓜亚游击队	63
一、巴西共产党与阿拉瓜亚游击队	63
二、中共与巴共的矛盾及双方关系的结束	64
结论	68
参考文献	73
致谢	78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79

导论

一、研究的问题

本文拟探索新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两国政府的接触以至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巴西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建立直接关系，直至双方断绝关系的这一过程，恰恰也是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关注亚非拉国家，直到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所以本文在论述中国与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将就新中国如何开展对外交往，在开展对外交往过程中世界革命与国家外交的双重使命在不同时期孰轻孰重等问题展开讨论。

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本文将考虑国际冷战中的不同因素，即 1) 中国革命胜利给巴西带来的影响；2) 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发展，给中巴关系造成的影响；3) 中苏关系演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使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发展更加曲折，也使得中巴关系有了变化；4) 美国在中巴关系中充当的角色，从一开始抵制中国对巴西的外交，直到最后与中国缓和、继而改变中国采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来处理中巴关系。

二、研究思路

本文将谈到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两个概念。所以，需要从定义上澄清国家和阶级的区别之处。国家的定义被本文认为是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主权和社会权力的机构。而阶级是一部分人群与其它人群，通过相连的生产关系形成的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变成了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过渡机器，并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形成没有阶级的社会为目的。

国家的基本利益是在国际关系中拥有足够自身生存的条件，如独立自主以及国际认可；而阶级的基本利益是占有生产资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全世界夺取政权、建立公共财产社会，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在不同国家进行革命才能彻底形成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一直单独生存，而要不断地输出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是统一的，两者都支持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各个国

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拥护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同样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

但无产阶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进行，而无产阶级阶级在某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夺取政权之后，往往还需要在世界革命胜利之前保持自己的生存，直至无产阶级在所有国家都取得政权。因此，由于受国际关系形势和历史进程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有时需要制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革命输出，有时则需要制定优先考虑国际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对外政策，加强革命输出。两方面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各有利弊，都值得观察和判断。

就中国而言，建国以后采取的国家对外政策一直在变，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重点在不同时间段也有所不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在一些情况下相通，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相互矛盾，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会推动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有时则反之。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会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官方外交行动，二是非官方外交行动。一般来讲，前者由政府负责，而后者由党和其他社会组织负责。两者的外交对象也不同，国家应对其他国家的政府，而党和社会运动则应对其他国家的阶级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一定要抱着阶级利益，而国家外交要抱着国家全面的利益。尤其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极为重要，而党与国家采取的方针大部分是统一的。

本文将采取辩证方式，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在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两个层面之间的配合与矛盾。为此，本文将探索中国对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政府和阶级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政策。用这种方式来探索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或无产阶级组织进行交流后，产生了怎样的反应，中国希望通过与巴西的关系获得怎样的结果，而此结果有利于国家外交利益还是无产阶级利益。

三、研究综述

本文研究的范围在于新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论文将参考与此相关的一些材料，从对广泛的中国外交的解释，即杨奎松、牛军、王玉贵等作者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至中拉关系史，如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和黄志良、孙洪波、周志伟等人对中拉关系的研究。

这类研究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的。对于党和党之间关系的研究十分有限、零散，而且缺乏系统化的信息。最有助于本文参考的作品是由威廉·E·拉特利夫对中国共产党在古巴革命后期对拉美的关系的分析，和 Matthew Rothwell 对中国共产党

与拉美国家共产党交流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 Otto Vargas、Ernest Halperin、Victor Alba 等人做的贡献。

在此范围内，本文还具体参考了一些有关中国同巴西外交的作品，同样分为国家层面和共产党层面的对外政策。前者有丰富的关于一些标志性史实的材料，如“九人事件”，由 Ciza Guedes 和 Murilo Fiuza、王唯真和宗道一、王勇、等人做的贡献；再如中巴建交，由雅尼丝·伊利克、André Mattoso Amado、Letícia Pinheiro 做的贡献。

有关党和党层面的关系，大多数作品资源来自巴西学界，本文引用了对于巴西共产运动的一些具体现象或人物与中国的关系进行分析，可见 Ângelo Priori 对 Porecatu 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的解释，Carlos Studart 对阿拉瓜亚地区的武装斗争和中巴共产党间关系的解释，Otto Figueiras 对“人民运动”的解释，Osvaldo Peralva 对巴西共产党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解释，Jaime Ribeiro 对毛泽东思想组织在巴西的发展的解释，等作者的贡献。

此外，本文也参考了马里格赫拉、佩德罗·波马尔、若昂·阿马鲁等曾经访问中国的巴共领导人的传记，他们由于自身是巴西共产党人而得以阅读到诸多党内资料，尤其是引用了许多巴共尚未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佩德罗·波马尔的传记由他的儿子执笔完成，书中内容较为真实丰富。

本文将把那些对中巴共产党关系的具体解释和中巴关系的零散分析，在中拉关系的范围内融合起来，借此尝试对中国外交政策与巴西之间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理解。

四、依据的史料

本文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巴西和中国两国所藏档案，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两国人士的会见记录。中国的档案中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年谱和文集，这些记录有他们与来自巴西各界人士的对话，例如巴西共产主义的访华期间的记录。尽管历史学术界还缺乏对这些对话的研究，但本文依旧从其中获得了不少消息。其次，在黄志良写的“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的作品里（2003 年），也有周恩来会见拉丁美洲人士的记录以及关于周恩来讨论中拉关系的话语。同样，巴西方面也有相关资料，可见 1976 年巴西警察从“Lapa 宰杀”中获取的关于巴西共产党（PCdoB）的报告，报告中有巴共在中国与中共领导对话的记录，如巴共与耿飚、江青等人的对话。除此之外，还有巴西共产党评论中巴关系的秘密报道，但许多消息尚未被解密，所以本文采用了一部分一手资料，另一部分则是我的二手资料，尤其是来自 Studard Corrêa 的独家资料，从而对论文主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也引用了不少新闻资料，如人民日报、Peking Review 和 Correio da Manhã（晨邮报）的报告，从中了解到两国的互相关注和评价。此外，中国共产党内部参考资料和外部参考资料中，能够查到中共关注巴西哪些方面的事情以及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档案馆也具备关于中拉关系的重要资料。同样，传统巴西共产党和亲中国的巴西共产党（PCdoB）所批准的文件和报刊也都被我采用作为参考。

本文还参考了中国外交部的公开档案，虽然有关巴西的资料并不多，但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有用的报告，尤其是关于中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民间外交的资料。本文也参考了中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从中了解了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巴西外交部档案馆的资料更充实，该档案馆揭秘过所有对中国的秘密报告，包括外交部研究中心撰写的论文，如 André Mattoso Amado 的作品。本文引用了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和巴西驻台北大使馆颁布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在这些报告当中，最有意思的是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从 1969 年起批准的一系列报告，如 1971 年总领事 Geraldo Cavalcanti 陪伴巴西速溶咖啡企业家 Horácio Coimbra 赴华参加深圳展览会的报告。

来自巴西的档案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来源，那就是巴西军事最高法院的档案。该机构拥有 1964 年 Sobral Pinto 律师为被巴西警察逮捕的九个中国人做辩护时收集的证据，其中有两千多页的档案与九个中国人在巴西的各种消息有关。除了最高军事法院的档案以外，五六十年代访问巴西的中国人也有自己编写的报告，如王唯真、黄志良、宗道一等人的作品。

除了以上这些，本文还进行了几次采访，采访对象是担任过巴中文化协会主席的丹尼路·桑托斯律师，以及曾经在中国参加政治培训课的巴共领导 Elio Garcia。同时，本文还参考了他人进行的采访，如雅尼丝·伊利克对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陈笃庆的访谈录（2001 年），Maurício Graboïs 基金会同参与阿拉瓜亚游击队、并在中国上政治培训课的巴西共产党人士的采访；还参考了电视节目中的一些访谈，如关于参与 Porecatú 游击队并访问过中国的巴共领导 João Saldanha 的纪录片，以及参加过中国政治培训课的几个巴共成员。

五、主要内容

本文从不同的时间段对上述题目进行分析。第一阶段，在 1949 年至 1954 年期间，将描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开展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在朝鲜战争前后中国与巴西的外交关系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而巴西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决定承认台湾政府。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了巴西共产主义运动，使得巴共采取更为激进的方针，甚至介入巴西农民武装冲突，从此两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发展。

在第二阶段，在 1954 年至 1959 年期间，将探索中国在国内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加深关系。当时亚非国家的解放运动掀起一个浪潮，而很多新成立的国家则追求经济发展和外交承认。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中央地带，所以努力寻求与它们开展经济和外交合作、甚至结盟。中国对拉美就像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要征服它们并提高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中国对巴西政府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希望可以一步一步与这个国家改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巴西共产党的新方针，此刻巴共开始主张巴西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化有助于无产阶级斗争，所以支持民粹主义政府。本文将分析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共产党在征服民粹主义政府的过程中，中国和巴共的交汇点以及不足之处。

第三阶段，在 1959 年至 1964 年期间，将首先描述巴西社会越来越激化，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左翼激进组织，并且这些组织不完全在传统共产党的控制范围内。巴西共产党同样发生了分裂，新建立的共产组织与苏联断绝了关系，并开始接近中国，中国共产党与该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加深了联系。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转变，尤其是中苏交恶和古巴革命，拉丁美洲开始引起中国的关注，从此中共意识到了拉丁美洲革命的机会，而支持巴西共产主义组织的激进的纲领。但同时，中国也与巴西民粹主义政府的关系也有了深刻的发展。当时古拉特副总统访问了中国，给了中国开辟了一些新的官方渠道。但因为巴西在 1964 年遭受了政变，所以中巴关系的正式发展暂时中止。

第四阶段，在 1964 年至 1969 年期间，将描述中国与巴西如何断绝了所有的官方政治关系。同时，中共同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加深联系。再探索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外交作风，如何引起了毛泽东思想组织在巴西的发展、以及促进了它们与中共的关系。

最后第五阶段，在 1969 至 1974 年期间，将探索中国与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互相接近和中巴两国共产党关系的结束。随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破冰，中国在联合国取代了台湾的合法席位等，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高了，并且中国国内政局也恢复了稳定。就巴西而言，该国政府正开始强调多元化外交，设法脱离之前推行的单一外交政策，因此在 1974 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巴西共产党推动的阿拉瓜亚游击战争也开始付诸实施，但没有得到中国的直接支持。此外，中巴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影响到中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由于巴西共产党对中国外交越来越感到不满，尤其是对中国对巴西的政策不满，所以最后巴西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结束了。

第一章 中国新政权与巴西共产运动（1949-1954）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巴西的反应

一、中共与拉美

在中国革命运动即将结束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原则，作为新中国初期的主要外交方针。一是“一边倒”，指出在冷战时期形成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下，中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二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出新中国“不承认外国政府当时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①三是，“另起炉灶”，提出要改变中国从1840年以来签署的不平等外交条约，而“与各国通过谈判，建立起反映平等和互相尊重原则的新的外交关系。”^②

新中国的外交指导原则对拉美国家官方外交没有直接的影响。对于“另起炉灶”，一系列拉美国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废除了原来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对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该措施的主要对象是列强，其目的“是为了在当时处理复杂的外交问题时，能立于主动地位，不受来自国际的影响和压力的约束，并在建国时期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③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谋求与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为了“使我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④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公开提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⑤

然而，中国对苏“一边倒”，使中国外交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承担着世界民族解放的任务，如毛泽东在1951年10月曾经说：

“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

①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同上，第36页。

④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新华社，1949年9月21日。

⑤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16页。

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①

“一边倒”政策对于中拉关系的影响，最明显地反映在政党关系方面，该政策给中巴政党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后，中苏两国共产党进行了明确分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②而苏联共产党则负责其它西方国家，也就是说，苏共集中关注以欧洲地区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而中共主要关注亚洲邻国的共产党。随着五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关注范围不断扩展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与中国距离遥远，但也算在中共的负责范围之内。随后中国和巴西共产党就开始有直接和有机的接触。

二、巴共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反应

二战以后，巴西共产党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政治过程。与此同时，巴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民粹主义——的关系也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反对民粹主义最早的领导人热图利奥·瓦尔加斯到支持他的政权，而最终又转向反对他。以下将探索巴西共产党在国内采取的主要步骤及其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

在四十年代初，瓦尔加斯总统一边镇压国内所有的法西斯组织，另一边也镇压巴西共产党，试图在两极力量之间占据优势地位。而在国际范围内，二战爆发时，瓦尔加斯作出决定，与美国结盟，反抗德国和其他法西斯国家。但共产党因为在国内受到冲击，而拒绝承认瓦尔加斯政府在二战中起到的进步作用，反而采取极左政策，与瓦尔加斯对抗。

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巴共改变了它原来的极左政策。当时瓦尔加斯政府已经开始衰败。在民众的要求下，瓦尔加斯政府不得不在经济上打击国外垄断资本，在国内政策上实行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共产党在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地下工作之后，得到了合法地位。从此巴共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二十万成员的全国性的政党。在1945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巴共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大量的选票，从而在国会中成为全国第四大党。^③

与此同时，巴西社会运动规模开始扩大，工人发动了多次罢工。但是巴共不愿意再回到非法状态，所以避免与政府直接对抗。因此，巴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在反法西斯的名义下，巴共决定与瓦尔加斯政府合

① 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

② 蔡佳禾：《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1954-1957）》，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③ 在1945年的大选中，巴共有14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当选。巴共的总统候选人 Ledo Fiúza 得到了10%的选票。

作。而且，这时期巴共也更加重视国内经济发展，发展主义的影响超过了阶级诉求。巴共认为，与政府合作有助于巴西的经济发展，稳定、繁荣的经济环境是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有利条件。由于这种政策转变，导致巴共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罢工等社会运动。巴共的温和态度最后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反抗力度的减弱。^①

但在五十年代前夕，正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巴西共产党的政治导向又发生左转。因为在 Eurico Gaspar Dutra 将军接任总统之后，巴西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Dutra 原来是瓦尔加斯政府的军事部长，他在瓦尔加斯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在他执政时期，巴西采取了右翼保守政策，也就是迎合列强集团的利益，取消国家经济保护政策，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大门。新政府遵循了美国的新外交政策，即杜鲁门主义，表示巴西会努力配合“自由世界”，并在国内外打击共产主义。例如，巴西与苏联建交两年后，在 1947 年又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巴共再次陷入非法的地位，1948 年所有巴共议员均被弹劾。^②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巴西共产党开始脱离对国家政府的依赖，更倾向于左翼，努力靠近社会底层的运动，并动员和组织民众。Dutra 政府在 1951 年下台，在新一轮选举中，瓦尔加斯再次当选总统。但这一次，巴西共产党没有支持他，反而向他施加压力。

巴西共产党的左转受到了中国革命的鼓舞。当时巴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且谈论中国革命的经验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两个月，巴共月刊 Problemas 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③ 该报刊是巴共向党内干部及社会开展宣传讨论重要议题的主要阵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为巴西树立了榜样，如 1950 年，巴西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给毛泽东和中国青年发电报说，“我们生活在共同敌人的后方、为美国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美洲大陆上的巴西青年向你们保证：我们决心努力学习你们的好榜样。”^④中共初次在第三世界大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向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展示出选择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促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变得更为激进。

巴共范围内的社会运动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一定影响。虽然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但一些有组织传统并采取过政治行动的社会阶层，一直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革命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兴趣。以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拉美最大的劳工组织——为例，这个组织拥有 650 万会员，它在 1950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通告，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指出“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一个

① Fausto, Boris, *História do Brasil*,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2, p.329.

②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35.

③ Problemas 月刊，1949 年 8 月 1 日。

④ 《巴西共产主义青年团电毛主席和中国青年致敬》，《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12 日。

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和人民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的巨大胜利。”^①

巴西共产党及其范围内的社会运动组织曾多次向中国示好。新中国首次国庆，巴西共产党主席普列斯特斯向毛泽东祝贺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及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这一胜利大大鼓励了巴西人民使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加倍努力。”^②

在拉美国家中，巴共是最先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的共产党之一。在 1949 年，作为 15 人国际新闻工作团一员的巴西共青团主席若昂·萨尔达尼亚，曾赴中国采访记录中国国共内战最后阶段的具体情形。^③萨尔达尼亚从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在 10 月 2 日到达北京。^④他在北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和款待，还在不同场合见了三次毛泽东。^⑤在新中国建立的月份，巴西共产党在 *Voz Operária* 报纸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详细报道，那很有可能是萨尔达尼亚自己写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主要事件，在中国革命当中，中巴共产党之间的实际交流相对较少。但还是能观察到巴西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一定思考与反应。中国给予巴西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启发是，中国的革命运动集中在农村进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略。因为当时巴西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一样，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而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显示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重点是利用农村的阶级矛盾。另外，毛泽东采取的长期武装斗争战略成功地打败了日本入侵和国民党军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武装革命以及工农联盟的战略，在国际共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受中国革命经验的影响，1950 年 8 月巴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发表了《八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建立“民族解放民主阵线”并组建所谓的“人民军队”。^⑥巴共在这份宣言中试图把工人民众的短期要求与激进的革命纲领联合起来。此后巴共还建立了一个内部小组——“特殊工作队”，负责以武装形式保护地下工作。^⑦

巴西共产党在 1950 年还介入了一次在农村爆发的大规模农民斗争。这次农民起义于 1950 - 1951 年间发生在巴拉纳州北部的 Porecatu 地区。当时巴西社会处于动乱时期，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斗争发展成为无地农民和贫农反对大地主非法收购土地的武

①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4 页。

② “LT. Presidente Mao Zedong, Peking / Em nome dos comunistas brasileiros saúdo o bravo povo Chinês no primeiro aniversári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pela vitória histórica da revolução, consequência da heroica tenacidade do proletariado e do povo liderado pelo glorioso partido comunista chinês. Isso inspira o povo brasileiro a redobrar a luta pela paz e pela independência nacional contra o domínio imperialista ianque. Ass. Luis Carlos Prestes.”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0457KW4/10。信流水号数 SPZ116，原来号数 GR720。

③ Jo ã Saldanha, *GloboNews* [1/3] (纪录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O5molKgeo>.

④ Vilarinho, Carlos, “Quem Derrubou Jo ã Saldanha”, *Livrosdefutebol.com*, 2010.

⑤ Jo ã Saldanha, *GloboNews* [1/3] (纪录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O5molKgeo>.

⑥ Magalhães, Mario, *Marighella - O Guerrilheiro que Incendiou o Mund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p. 151.

⑦ *Voz Operária*, 1950 年 8 月 5 日。

装冲突。在巴拉纳州的冲突中，巴西共产党与农民联合进行武装斗争，并在全国发动声援运动。^①这次活动坚持了两年时间，后来受到了联邦政府的镇压，甚至周边的城市 Londrina 的共产党干部也受到迫害。^②巴共领导若昂·萨尔达尼亚也加入了巴拉纳州的斗争，他从中国回到巴西以后，被派往该地参与武装斗争，在那里作战直到被镇压为止。虽然没有历史资料能证明，他访华时是否曾受到中共领导的建议，让他回国后参加游击队，但可以推测，萨尔达尼亚曾见证的中国革命，确实影响到了他在巴西开展的工作。

三、巴西政府的反应

中巴两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是通过 1881 年签订的《中国 - 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当时，列强极力扩大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而巴西利用这一时机，同样获得了治外法权和“最惠国”的地位。到了民国初期，巴西对辛亥革命表示了同情，并与袁世凯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巴西在 1913 年 4 月 9 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但原订条约继续有效。

1943 年 8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公使馆与巴西外交部在里约热内卢签订了《友好条约》，两国才在平等条件下建立了外交关系。三年后，两国又签订《文化专约》，规定两国“密切合作，以求于科学技术、文艺及其他文化方面做积极之交换。”但由于中国内战导致的不稳局面，两国签订的条约未能实施。

在内战后期，巴西驻南京大使馆由于治安问题而关闭，搬到上海总领事馆暂驻。在新中国成立当月，巴西所有外交代表撤离上海，又到驻东京大使馆暂驻。^③巴西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承认台湾国民政府，决定保持中立立场。在驻东京大使馆，原来驻华的巴西外交官处理巴西同两岸政府的事务，并多次向巴西外交部提交关于两个政权的报告。^④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巴西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持谨慎态度，但没有表示全面的外交否认。拉丁美洲国家多多少少都保持类似的态度，有些国家甚至透露出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意向。^⑤这体现出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段时间还拥有较为宽松的外交环境，有一定的政治空间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

① Priori, Ângelo, “A Revolta Camponesa de Porecatu”, Fortaleza: ANPUH – XXV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9, p. 4、5.

② 《Sangue Pela Terra Prometida》，Gazeta do Povo，2011 年 8 月 12 日。

③ 巴西驻华大使馆致电外交部，上海，1949 年 8 月 17 日。

④ 巴西驻台北大使馆电报，编码 1388，1953 年 1 月 22 日。

⑤ 例如，墨西哥政府召回了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代表，而且没有再派新任代表去台湾。1950 年 7 月，墨西哥最高法院院长在墨西哥城的外交活动中还告诉波兰驻墨西哥大使馆，他们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波兰政府转告中国。1952 年，智利当选的中左派新总统卡洛斯·伊巴涅斯尚未就职，就派出了私人代表德阿梅斯蒂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中，该代表与周总理单独会见，转告了伊巴涅斯总统执政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的意向。当时周恩来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并提出积极进行谈判的建议。

第二节 朝鲜战争爆发后政党关系的发展

一、中美在拉美的外交角力

在上述背景下，朝鲜战争爆发时，拉美国家各国政府选择采取中立立场。巴西政府因以下两方面因素最终不加入战争：1）瓦尔加斯希望通过加入朝鲜战争来争取美国对巴的优惠政策，吸引美国和其它列强的外资，所以与美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谈判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巴西政府的需求，最后瓦尔加斯决定只给美国优惠提供矿产资料，放弃加入战争；2）巴西社会对参加朝鲜战争的支持率很低，在国家政局动荡不稳的情况下，巴西政府不愿冒险采取此项不得人心的决定。

巴西政府对朝鲜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两个原因，特别是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是受到中国与巴共合作之影响。当时巴西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的运动，反对巴西参与朝鲜战争。巴共在各州组织了群众游行，并在国内说服各种社会组织和人士来推动和平运动，有效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①

巴共推动的和平运动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很大关注，人民日报对它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积极鼓励拉美共产运动反对其国家政府加入朝鲜战争，并邀请拉美各界人士赴中国参与相关会议，如 1952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也是拉丁美洲代表团第一次大规模的访华。^②出席此次会议的拉美成员共有 150 人，相当于外宾人数的三分之一。拉美代表团中有两位嘉宾来自巴西，分别是一名医生和一名里约热内卢大学教授。他们在会议报告中指出，巴西人民反对巴西参加朝鲜战争。^③

在宽松的外交环境下受中国的影响，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哥伦比亚加入联合国军与朝鲜作战。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和共产党政权在新中国的巩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逐步加强，在此区域与中国展开外交角力。

美国通过经济和军事势力渗透，致力将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纳入西方框架之内。美国开始推动新的共同防卫战略，规定美国有责任抵抗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④此后，拉丁美洲国家纷纷与美国签订军事协议，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对于巴西而言，巴西外交部决定派外交代表前往日本东京。驻东京大使馆同样负责管理有关中国的事务，三年间与北京政府保持着微妙的联系。可见：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48 页，50-51 页；另外可见：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① Fausto, Boris, *História do Brasil*,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2, p. 351.

②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7 页。

③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第八日会议，继续听取各国和平代表发言》，《人民日报》，1952 年 10 月 10 日。

④ 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20.

它们断绝了与新中国的联系，反而与台湾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截至 1959 年末，已经有 20 个拉美国家与台湾建交。^①

1952 年，巴西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协议。^②当年 12 月，巴西瓦尔加斯政府与北京政府断绝了联系。同时，巴西向台湾派驻了大使，成为首个向台湾派驻大使的拉美国家。此前在台湾驻有大使的国家只有美国、日本和韩国。

实际上巴西与台湾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往来。所以巴西驻台湾当局的大使在给巴西外交部的电报中也说：“如果巴西在这个地区存在利益，我相信驻东京大使馆有足够的管辖权进行有效管理，这样既能节省国家预算也符合国家的外交传统。”^③

在美国加大压力的背景下，巴西政府不仅从正式外交方面破坏中巴关系，还试图抵制中巴两国的人际交往。1953 年 1 月，巴西警察在里约热内卢的加利奥机场逮捕了奥利姆皮奥·邦戴萨与爱米利奥·皮里沙等两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巴西代表。^④

二、政党关系的发展

在巴西政府中断与新中国的联系之后，尽管受到政府的迫害，巴西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仍保持联系，并继续发展。1951 年，Porecatu 农民斗争被镇压以后，巴共领导人若昂·萨尔达尼亚，又一次访问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⑤除了他以外，1952 年初著名的共产主义作家乔治·亚马多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以后，从莫斯科前往中国。^⑥他和夫人，古巴诗人吉里安，在中国停留将近一个月，并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受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节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协会代表人的热情接待。^⑦虽然亚马多不是巴西共产党派遣的代表，但他在不同场合上发表了关于巴西人民反对巴西出兵朝鲜战争的斗争和巴西国内阶级斗争局面的报告，如他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会上所讲“在拉丁美洲，在我们国家里，我们有一系列的小蒋介石，他们叫做瓦尔加斯（巴西）或是庇隆（阿根廷总统）；叫做魏地拉（智利总统）或是特卢吉罗（多米尼加总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人民有很深的仇恨，对帝国主义就绝对地服从”。^⑧

①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② 该军事协议有效期至 1977 年。

③ 《巴西驻台北电报》，第 53 号，1954 年 9 月 23 日。

④ 《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15 日。

⑤ Bertolino, Osvaldo, “João Saldanha: O Futebol e O Jogo da Vida”, Centro de Memória Sindical, 2014.

⑥ 《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等抵达北京》，《人民日报》，1952 年 2 月 1 日。

⑦ 《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等抵达北京》，《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1 日；另参考：《亚马多和吉里安昨天离北京苏联》，《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1 日。

⑧ 《拉丁美洲的和平运动：一九五二年二月七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欢迎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2 年 2 月 18 日。

1953 年 7 月巴共第一次组织正式代表团访问中国。^①率领该代表团的是卡洛斯·马里格赫拉。这位著名的巴共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模式比苏联领导人主张的革命模式更符合巴西的需求。^②马里格赫拉个人在中国呆了一整年，其间走访了不同地区，参观了抗日战争和内战的根据地，拜访了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他在各地进行了有关巴西的各类演讲。在回到巴西之后，他也慷慨地分享了此次访华的感想。^③马里格赫拉参与了巴共的左转决策，他自己在几年后一直主张激进的武装革命纲领。

④

巴共在左转方针下再次介入了 1953 - 1955 年间发生在戈亚斯州内地的 Formoso e Trombas 地区的农民起义。巴共干部同样参与并指导了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在巴共领导下的阶段，该起义就受到了国家的压制，但直到 1964 年后的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才被全面镇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各大媒体已经有关于巴西重要事务的详细报告，但关于巴共领导的两次农民武装斗争却基本上没有报告。据前文，访华的巴共领导和代表团在中国的公开会议上讲到巴西国内阶级斗争的问题，那他们会见中共领导时自然会提及巴共所开展的各项活动。所以中国共产党极有可能已经了解到巴西发生的这些农民起义，但选择不公开表态。这可能是由于中共考虑到巴西共产党的处境与安全问题，或者是因为考虑到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共不愿意公开表示关注巴西的颠覆活动。

无论如何，Formoso e Trombas 地区的农民斗争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即便是主观的启发。可见，有学者指出，此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José Porfírio 喜欢读毛泽东的著作，还把它作为重要的榜样和参考。^⑤

① Rothwell, D. M.,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 22.

② Magalhães, Mario, *Marighella - O Guerrilheiro que Incendiou o Mund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p. 157.

③ 同上。

④ 马里格赫拉参与了巴共的左转决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六十年代开始与党内其它领导产生了激烈纠纷，这一冲突以他被巴共开除而告终。此后马里格赫拉在 1967 年建立了著名的“全国解放运动”（*Ação Libertadora Nacional*），该组织与中共没有保持直接联系，也没有按照中国革命模式专攻城市武装战略，但马里格赫拉在中国学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毛泽东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革命理念。

⑤ Esteves, Carlos L. S., “Nas Trincheiras: Luta Pela Terra dos Posseiros de Formoso e Trombas(1948-1964) - Uma Resistência Ampliada”. Programa de Pós-Graduação em História - 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2007, p. 33.

第二章 中巴关系的发展与巴共的配合（1954-1959）

第一节 中国与巴西政府的接近

一、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新战略

抗美援朝结束以后中国立即将重点工作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共竭力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推动现代化。于是从 1953 年开始，中央政府贯彻像苏联模型似的工业化政策，并将生产资本货物用来建立可持续的自力经济和先进的国防军队。这被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犯威胁的主要举措。^①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共需要有利的国内外条件，即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一段时间的世界和平。按照毛泽东的话来看，中国只要有十五年的和平环境，就“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②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一方面需求和平，一方面又能保障和平。也就是说，为了发展经济，毛泽东宣扬争取和平，而为了保证和平，中国需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当时苏联发展核武器以及针对美国的太空竞赛，展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定成就，这些成就正是中共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优势，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优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使世界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③所谓的转折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快要追赶上西方列强的经济实力。苏联开始宣传要十五年就能赶上美国，而中共开始宣传在同样时间内就可以赶上英国。为此中国在第二次五年计划中，竭力动员民众以促进工业化和农村公社，开启大跃进运动。

在 1959 年，毛泽东向巴西及其他十个拉美国家请求，希望它们配合争取稳定环境以完成经济建设：

“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④

① 可见毛泽东：《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18 页。

② 毛泽东：《国际形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96 页。

③ “这就使得早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的优势，和平力量对战争力量的优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使世界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参见：《周恩来总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件集》（1958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第 9 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59 年 10 月 5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 200 页。

中国国内发展的同时，国际局面也在经历重要的改变：五十年代中旬，冷战的两级阵营，基于势力平衡而关系有所缓解，同时亚非国家经历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

^①这些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与列强之间存在一些摩擦，因此对社会主义阵营有一定的好感，并需要它的支持。^②

中国在 50 年代中期与三十个亚非国家参与了万隆会议。会议中，周恩来公开发表了他一年前与尼赫鲁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成为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准则。中国追求稳定的环境以便完成经济建设，恰恰符合举办万隆会议的联盟国家所提倡的“要增加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宗旨。后来，中国政府还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经济援助，例如在 1956 年中国给了柬埔寨提供援助，随后又向新兴民族国家进行较为大规模的经济援助。^③

在这种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便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从此中国致力于寻找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点并加以利用。毛泽东相信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④他初次介绍“中间地带”这个概念是在 1946 年 8 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话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和苏联对阵之间，存在着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美国为了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首先需要争夺中间地带，所以国际政治矛盾的中心是，美国企图征服“中间地带”，与那里的民族进行斗争。

截至 60 年代中期，争取“中间地带”在中国外交工作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

^① 解放运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撒哈拉以南国家：在中国建国时，这个地区所有的国家都是殖民地，但 50 年代末，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增大，截至 1968 年，殖民地制度基本衰落，这个地区建立了 35 个新的民族国家。可见：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179 页。

^② 以埃及为例，纳赛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埃及国家的资产阶级，但他进行了民族路线，反抗英国和法国公司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并导致军事冲突以控制该地区，中国大力支持埃及政府。而 1956 年 6 月，纳赛尔宣布苏伊士国有化后一个月，埃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埃及开始靠近社会主义阵营。

^③ 在 60 年代，中国对这些国家继续增加援助，中国通过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试图同美国和苏联对抗竞争，虽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大大低于前面两者，并且中国也未形成像它们那样明确的政策，但无论如何，中国也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支持，甚至在 1964 年，周恩来访问加纳时都提出过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原则：第一，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不把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对外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援建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提供自己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设备和物资不符合商定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提供技术援助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所提供援助的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至受援国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参见：周恩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964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88—389 页。

^④ 毛泽东：《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195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88 页。

任务。^①而中国的确成功地争取到了一批亚非国家的外交支持：从 50 年代中旬到 60 年代中期，中国与 26 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使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的外交伙伴关系比例中超过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当中只有三个是社会主义国家。^②

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正如毛泽东接受巴西通讯员马罗金（Murilo Marroquim）和杜特列夫人（Maria Graça Dutra）的采访时说道：“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③但还是存在很多共同点，“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④

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没有经历解放运动，早就独立于殖民者，不像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在进行解放运动。但这些国家政府同样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阶级代表民族主义，有希望独立的意图。所以它们也一样处在中间地带，也就意味着中国要争取它们，所以一边扩大中国的影响，一边反抗美国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如今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却不适用。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更多。”^⑤

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非常薄弱，因客观条件受限，如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姻缘缺乏和经济联系不足，所以中国与很多拉美国家的联系都很难维持。^⑥然而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希望也很微妙，如果能够争取到它们的外交承认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旦对中国伸出手，中国立即趁机牵住。正如毛泽东向巴西记者

①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177 页。

②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解放的新国家大多数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而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战略力度。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进行官方合作时，有时对其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会带来一定损害，尤其是在中共影响较大的地方。例如，中国和缅甸在划定两国边境时，为了跟缅甸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停止了对该国共产党的援助。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受中共的鼓励，削弱了对苏加诺政府的反抗力度，印尼共产党没有在农村开拓基地也没有进行武装自我保卫，所以 1965 年国家遭受政变时共产党很轻易地被镇压。可见：“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MLM Revolutionary Study Group in the U.S., Jan., 2007, p. 25, 26.

③ 毛泽东，1958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338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例如，1953 年 6 月，阿根廷国防部红十字会邀请中国红十字会青年部派青少年赴阿参加作品展览会，但因通知时间较迟中国未能成行。其次，在 1959 年 11 月，受智利妇联邀请，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智利参加拉美妇女大会，但因申请签证较晚以及沿途不利天气等原因，到达智利后大会已经闭幕。可见：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所说的，“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①

中国政府希望在不同领域能与拉美国家增加交往，即便从基础层面开始。所以周恩来外交部长提出民间外交政策以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该政策带有积极性质，它试图摆脱国家和国家政府的外交垄断角色。“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不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人民之间应该初步增加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1956年7月，周恩来会见来自巴西、阿根廷与智利记者时，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民间外交政策：

“中国希望同拉美各国开展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民间团体开始，这些做起来有困难，甚至有外来的困难。我们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必须一步步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是被迫的，被美国所迫……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拉美同中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局面总会出现的。”^②

总之，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有显著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建立更深入的外交关系，从而获得其政府的外交支持和配合。为此，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利用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点来接近他们。

中国外交战略并不排斥非官方的交往，反而利用这种交往，从贸易和文化层面关系的发展，逐步促进政治关系发展。如此，中国外交按照一种线形级别的逻辑，从文化和贸易交流关系逐步走向更充分的政治同盟。文化和贸易层面的外交关系可以起到一种补充和配合政治层面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前者的作用仅仅是为了促成后者，文化和贸易层面的交往本身也给中国带来利益。

二、中巴贸易的发展

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增加贸易交往，中国在1952年5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席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向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便利条件，开展民间贸易往来。该机构成立当年就开始接待来自的巴西代表团，如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以后来中国参观的四人代表团，即奥利维（工程师、经济学家）、奎马瑞（新闻工作者）、马丁（建筑商、新闻工作者）、塞基诺（纺织工业家）。^③除了接待巴西人访华以外，中国贸促会也促进中国代表团访问巴西。可见该机构初次组织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58年9月2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8页。

②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

③ 《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后来我国参观一澳大利亚、巴西和英国代表昨天抵达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4月21日。《国际经济会议巴西等代表昨乘飞机离北京反国》，《人民日报》，1952年5月4日。

问巴西的代表团是在 1955 年由冀朝鼎主席带领的代表团，此行以扩大中国与巴西工商界联系为目的。^①

中巴两国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推动工业化需要一系列原材料和基础产品。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供应方主要来自于巴基斯坦、缅甸、埃及、叙利亚和印度，虽然巴西榜上无名，但其出口行业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对中国的蔗糖、棉花和咖啡出口不断增长。从巴西经济进口需求来看，它的工业部门需要中国生产的煤炭，因此中国对巴西出口也具有较大市场发展前景。^②

中国与拉丁美洲加强彼此间的经济交流，一方面满足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国家外交利益，可以借此逐步争取到拉美国家的政治支持。而从巴西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政府并不排斥与中国进行贸易，反而期待可以增大经济交流。中巴两国因此共同谋求以贸易交换为基础的共同发展。

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巴西的蔗糖、棉花、咖啡等行业不同代表人士都赞成与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贸易关系。如 1953 年巴西东北，伯南布哥州立法议会公开主张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流，“从国家利益着想，这样做是必要的。”^③巴西东北部是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蔗糖，所以保罗·卡瓦尔康帝议员和立法议会其他议员认为，“扩大蔗糖贸易能解决东北各州普遍存在的危机”。^④其次，圣保罗州农业联合会会长，Pedro Paiva，也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他说，“贸易与政治体系是不相关的，巴西政府不可以因为政治原因，卖不出去五百万袋剩余的咖啡”。^⑤

这样一来，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有了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相信经济发展主义的政治家。如此，巴西许多不同政党派代表访问中国。其中，1956 年 6 月，五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其中两位是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另两位是民粹主义党（劳工党和共和党）的党员，还有一位是右翼反对党（国家民主联盟）的党员^⑥。他们在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⑦代表团团长 Getulio Moura（社会民主党）在中国议会上发言，赞扬新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时期以出口基础产品为主的经济”^⑧。他还说道：“我不能判断中国革命产生的政治体系（……）但我能保证中国人民的确重生了。”^⑨

①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65 页。

②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1971 年 11 月 1 日，《巴西—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关系》Horácio Coimbra 先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③ 《巴西企业界要求开辟新市场，主张和所有国家建立外贸关系》，《人民日报》，1953 年 6 月 17 日。

④ 同上。

⑤ “Resenha Semanal - No País”，*Correio da Manhã* 报刊，1961 年 9 月 16 日。

⑥ “Senadores Brasileiros na China”，*Correio da Manhã* 报刊，1956 年 6 月 15 日。

⑦ 《毛泽东年谱》（1956 年 6 月 21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 587 页。

⑧ “Parlamentares Brasileiros na China”，*Correio da Manhã* 报刊，1956 年 6 月 23 日。

⑨ 同上。

1956 年 12 月还有四位巴西议员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共赴中国访问。此次代表团以巴西社会党副主席维拉斯科参议员为团长，另外有巴西众议员马兹利（社会民主党）、布拉加（社会民主党）、卡洛斯（劳工党）及其夫人。在宴会上，他们与中国人民外交学院会长张奚若谈到：“我们非常钦佩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作出的伟大努力。”^①张奚若则回答道：“中巴两国虽然在地理上相离很远，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我们两国间友谊的日益发展和相互了解的日益增进”。^②

三、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为了促进新闻传播与文化交流工作，1957 年，北京广播电台创办了西班牙语栏目。1960 年起，创办了针对巴西以及其他葡萄牙语国家的广播节目。最初的葡语节目广播一周 10.5 小时，从 1966 年起延长为 28 个小时一周。^③北京广播电台获得了巴西业界人士的支持。葡文部门起初有八名成员，其中有两对巴西夫妇（Benedito de Carvalho 和 Lídia de Carvalho, Carlos Friedman 和 Nair Rotman）。^④随着电台的扩大，其它巴西人士也参与其中，巴西共产党员 Jaime Martins 和 Angela Martins 这对夫妻在那里工作近二十年。^⑤

1963 年，开设了《Peking Informa》，相当于西班牙语版的《Peking Review》报，同年年底这份杂志成为周刊。^⑥当时中国还开设了其他西班牙语版的刊物，如《China Reconstruye》（英文版 China Reconstructs）、《Ciencia China》、《Mujer China》和《China Ilustrada》。后来，新华社也专门面向拉丁美洲国家开设了西班牙语版报纸。^⑦

为了在中国普及拉美文化，中国出版社从 50 年代起开始发行巴西书籍，尤其是著名的共产主义作家乔治·亚马多。中国的很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如《希望的骑士》（由人民出版社在 1953 年出版）、《黄金果的土地》（由作家出版社在 1956 年出版）、《饥饿的道路》（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 1956 年出版）、《无边的土地》（由群众图书公司在 1958 年出版）。当时中国还出版了其他巴西作家的作品，如巴依姆写的《时候就要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 1959 年出版）和儿童作家罗巴图写的《娜斯塔霞

① 《张奚若设宴欢迎巴西参议员》，《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 日。

② 同上。

③ Tsai, T.C., *China's New Diplomacy: Interpreting its Connotation and Tendency*, Taipei: Wunan Books, 2008, p. 61.

④ 四个中国成员中，有两人从其他部门调到葡文，另两人是从澳门来的。可见：Fanzine, *Edição Especial*, 2010, <http://portuguese.cri.cn>.

⑤ 他们 1962 年开始在 C R I 葡语部工作，由于初期缺乏翻译播音人员，他们指导中国同事并参与日常的采访、翻译、改稿和播音工作。他们是在国际台葡语部工作时间最长的外籍专家。参见：中国国际电台；《Cripor 55 anos ao seu lado》；另外：Fanzine, *Edição Especial*, 2010: <http://portuguese.cri.cn>.

⑥ Tsai, T.C., *China's New Diplomacy: Interpreting its Connotation and Tendency*, Taipei: Wunan Books, 2008, p. 61.

⑦ Ofício da agência Xinhua, 25 de abril de 1963, Beijing (新华社致信，1963 年 4 月 25 日，北京)。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folha 1340（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1340 页）。

姑姑讲的故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在 1959 年出版)。六十年代初,中国又出版了一批巴西作家的作品,如库尼亚写的《腹地》、斯密特写的《远征圣保罗的秘密》以及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选。^①此外,中国还陆续接待了一些巴西艺术家访华。^②

中国采取的民间外交政策,既是“请进来”又是“走出去”,“广泛地开展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民间交往”,^③也需要各领域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巴西。例如,1958 年 8 月中国杂技团访巴和 1963 年 10 月中国建筑师代表团访巴。^④后者有八名成员,它们由巴中协会承接,会见了巴西各阶层人士。^⑤

新华社经常派记者随中国代表团一同走访拉美。例如 1956 年中国艺术团访问巴西时,新华社记者随团采访了亚马多作家、巴西议员以及巴西大学的院长。^⑥新华社也曾派记者代表团赴拉丁美洲,例如 1959 年曾访问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古巴。^⑦

中国还成立了各国家文化友好协会。1953 年,巴西在首都里约热内卢成立了第一家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一年后在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又成立了第二家。^⑧此协会 1959 年正式出版了第一本章程,记载了其主要的工作宗旨:支持和组织中巴文化代表团进行两国互访;通过书刊、展览等各种渠道推动中巴文化在两国的普及;为中巴学生提供前往巴中留学的奖学金等等。^⑨后来在 60 年代,在巴西各个地区都成立了巴中文化协会分会,如南大河州、尼泰罗伊市、贝伦市和巴西利亚分会,^⑩新成立的分会通常接受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化协会的指导与支持。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化协会还负责在

① [巴西]雅尼丝·伊利克:《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204 页。

② 例如 1958 年 1 月,两名巴西艺术家在上海举办现代雕刻和书画展览;1960 年 4 月,巴西钢琴家 Araldo Estrella 和其夫人小提琴家 Mauricia Iacovino 在中国巡回演出;同年,来自巴西的十二名舞者在中国一系列城市进行了桑巴舞巡回演出。可见:1960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巴西桑巴了团离上海去广州》。

③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52 页。

④ Relatório da Diretori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apresentado na Assembléia Geral Ordinária realizada a 29/11/1963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主任在 1963.11.29 大会的报告)。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82; (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82 页)。

⑤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致信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里约热内卢,1964 年 3 月 3 日(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主任在 1963.11.29 大会的报告)。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74 (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75 页)。

⑥ 《我国艺术团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义演—巴西总统赠送花篮,总统夫人主持闭幕演出》,《人民日报》,1956 年 09 月 27 日。另一个例子是 1961 年李信年记者陪伴南汉辰带领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参见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42 页。

⑦ 除此之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分别在 1960 年 8 月和 1962 年 3 月访问了巴西,60 年代在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建立了常驻办公室。可见: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80 页。

⑧ 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78 页。

⑨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 (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 页)。

⑩ Diretori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de Brasília, 28 de abril de 1964;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131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主席,1964 年 4 月 28 日,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131 页)。另外:Correspondência para a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Sino-Latin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3 de março de 1964 (致信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1964 年 3 月 3 日),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93 页)。另外:Enviar Material, n°22 (寄送材料,第 22 号)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39 页。

巴西分发来自中国的文献，或者分发给其他城市的协会分会，或者分发给其他相关组织或人士。^①此外，根据里约巴中文化协会的报告，它的收入来源有 74.8% 依赖成员每个月的捐赠。^②该协会截至 1964 年已有 950 名同意捐赠的会员，^③每人每月的赠券至少为 200 巴西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五毛钱）。^④

为协助各国友好协会与文化协会的工作，进而促进与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 1954 年 5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后两年，第一任会长楚图南带领文化代表团访问了拉丁美洲国家，其中也包括巴西。

来自巴西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各个机构保持联系。这些机构根据代表团的性质进行区别接待，如果是工会代表团访问，一般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待，^⑤如果是妇女代表团，则由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接待。^⑥无论如何，代表团一般都会收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或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指南。^⑦在巴西，巴中文化协会在接待赴巴西的中国代表团之外，也协助筹划巴西人访华等事宜。

中国推动的民间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在巴西的影响。中巴文化交流不断增长，巴西民粹主义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访问巴西持欢迎态度，例如楚图南带领艺术团访问巴西时，该团在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因奥体育馆给两万巴西的观众表演了中国传统京剧。^⑧该演出由巴西总统夫人协助组织此活动并担任主持人，巴西总统库比契克本人也观看了演出，而演出结束后总统女儿还上台为演员们献花。^⑨巴西外交部虽然一开始拒绝了给中国艺术团发签证但后来又表示好感，而且外交部长本人也去观看。^⑩

① Enviar Material, n° 22（寄送材料，第 22 号）。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 34.582 p. 239（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39 页）。

② Relatório da Tesouraria -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财务报告）。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 34.582 p. 182（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182 页）。

③ Ficha de Controle de Cobrança; exercício de 1964（1964 年，各月赠券名单）。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 34.582 p. 145 à 173（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财务报告；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145 至 173 页）。

④ Rio de Janeiro, 8 de maio de 1963, Carta da Secretári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Raquel Cossoy à Cid Cabral, Manaus, Amazonas（巴中文化协会秘书 Raquel Cossoy 致信 Cid Cabral，玛瑙斯，亚马逊州）。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 34.582 p. 263（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财务报告；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63 页）。

⑤ 如 1962 年 1 月 Roberto Morena 率领的代表团，他在共产党担任过名义议员，访问时以瓜纳巴拉州（目前的里约热内卢市）木匠工会领导的身份率团。可见：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电报，513 号，1962 年 1 月 8 日。

⑥ 如巴西妇女代表团在 1963 年 7 月访华。可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60 页。

⑦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59 页。

⑧ 《我国杂技使巴西观众倾倒》，《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7 日。

⑨ 《我国艺术团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义演——巴西总统赠送花篮，总统夫人主持闭幕演出》，《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7 日。

⑩ 《巴西的动人景色》，《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10 日。

第二节 巴共的政策转变与中国的态度

一、巴西民粹主义政府的工业化与巴共的政策转变

1954 年，在瓦尔加斯第二次执政的最后阶段，巴西共产党开始经历第二个转折，再一次主张与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之间改善关系。从此，巴共重新采取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巴共在 1954 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方案，不仅没有给民族资本带来任何威胁，反而认同它的先进角色，尤其是在工业化发展方面。^①

瓦尔加斯政府统治结束后库比契克上台了。新总统和推动大跃进的中国领导一样，相信巴西也可以赶上列强国家的经济水平，在五年的统治时期里，他要求巴西要收获“五十年时间的发展成果”。^②

这种经济发展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开始受到了巴西共产党的支持。如此巴共对库比契克虽然保持批判态度，但一直都拥护他。普列斯特斯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为中国人解释了这种联盟的原因：

“虽然库比契克先生的政府继续对帝国主义让步，而且最近在国内加紧了
对工会自由和罢工权力的进攻，但是爱国力量仍然获得了重要的局部的胜利
(…) 当广大劳动群众愈是深受政府所采取的、使生活费用飞涨的反动措施的痛苦，民主自由权利就愈能成功地得到保卫，劳动人民甚至共产党人就愈能普遍地、顺利地展开为他们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群众要求改变现政府的政策和成分的压力也就愈大。”^③

二、中共对巴共政策转变的回应

巴西共产党在往阶级合作政策的转折过程中，拥有赫鲁晓夫的政策支持。苏联共产党从 1956 年 2 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公开主张议会道路获取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与美国确立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个现象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包括巴西共产党，并且最后还导致了严重的分裂。

当时中共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内部已经开始发生纠纷。而值得思考的是，该纠纷在初期阶段是否影响到了中巴两党间的关系。

举例来看，巴西及其他拉丁美洲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一部分人接下来直接

①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40.

② “50 anos em 5”是库比契克政府的主要口号。

③ 《路·卡·普列斯特斯同志的贺词》（1959 年 9 月 28 日），（普列斯特斯时任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132 页。

访问了中国，另一部分人还在中国停留到九月份，并参加了中共第八代表大会。巴共在中国事先得知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①率领此代表团的是巴共组织秘书，提奥奇尼斯·阿鲁达，他是普列斯特斯麾下的第二重要领导。^②根据巴共信息秘书 Osvaldo Peralva 的记录，^③阿鲁达在华会见了各个中共领导，还与毛泽东谈话两个小时，他回到巴西时就不断地宣扬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和苏联的罪恶。^④随后阿鲁达批评巴共中央其他领导的“改良主义倾向”，而因此被开除中央委员会。^⑤

巴西在 1964 年发生政变时，中国共产党谴责赫鲁晓夫对拉丁美洲政策有误。中共认为，在美国武装干涉拉美国家的条件下，苏联提出的缓和态度是无效的。^⑥中国英文刊物 Peking Review 发表了文章，阐述被开除的巴共成员对此事的消极地评论。文章中说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共，“遵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的总方案，而采取整套改良主义措施……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⑦该评论是在巴共发生分裂以后提出来的，但在五十年代中旬中国共产党对巴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是否就已持有一定意见呢？

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与巴西人对话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阶级合作的看法。毛泽东相信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先行于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主张无产阶级需要领导一切，他认为民主革命不再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过程，民主革命取决于共产主义的领导，而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⑧所以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在 1959 年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时，毛泽东与他们进行的对话中说：

“我们用社会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⑨

① Peralva, Osvaldo, “O Retrato”, Centro Edelstein de Pesquisas Sociais, 1960, p. 35.

② 同上。

③ Osvaldo Peralva 与提奥奇尼斯·阿鲁达一起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④ Peralva, Osvaldo, “O Retrato”, Centro Edelstein de Pesquisas Sociais, 1960, p. 35.

⑤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43.

⑥ “China aponta Brasil como prova de que linha suave de Kruschev não funciona”, *Jornal do Brasil* 报刊，1964 年 5 月 1 日。

⑦ Since 1958, the Brazilian revisionist headed by Luiz Carlos Prestes have worked out a whole set of reformist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ses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y repudiated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Leninism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razilian revolution would develop along the path of non-violence. 参见：《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Brazil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unista Party of Brazil》，Peking Review 报刊，22 号，1965 年 5 月 28 日。

⑧ Mao Zedong: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1930 / 01 / 05,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

⑨ 《毛泽东年谱》（1959 年 10 月 5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 200 页。

尽管在这些公开的记录中没有任何中共和巴共谈论巴西资产阶级政权的对话，无法知道毛泽东对于巴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是否曾直接给出意见，但可看到他对巴共的工农联合纲领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1956年，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后到访中国，毛泽东告诉其成员，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他们不一定适用，只能供他们参考。^①但他还是建议巴西共产党应该多进行农民斗争：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调查一两个农村的具体情况。这样，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才符合农村的实际。”^②

三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巴共的主要领导人普列斯特斯率领代表团在北京出席庆祝大会。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时候又重申“巴西共产党应该有一个土地纲领来争取农民”。^③

无论如何，从中巴两国共产党发展的实际联系可以看出，中共对巴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没有意见。巴共与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配合工作，与中国和中共对巴西的政策不存在任何矛盾，反而有不少交汇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对巴西民粹主义政府持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中国推动的民间外交政策始终受到巴西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二者并行不悖。

常驻巴西的中国代表团一般都与巴共领导和社工运动干部保持着一定联系。新华社记者王唯真曾向里约热内卢警察报道说，赴巴西之前他从去过巴西的记者和朋友们手上获得了一个名单，上面提供了一些人的地址，并被告知抵达巴西后如有困难可以向这些人求助。名单上有亲中国的共产主义领袖，如若昂·阿马鲁、毛里西奥盖伯斯、佩德罗·波马尔以及共产党领袖，如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④

然而，值得注意访问巴西的中国代表团虽然一般会接触巴西共产党领导——如1961年5月，赴巴西的经济贸易代表团收到普列斯特斯的邀请并与其进行会谈——但是中国代表团成员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这些成员通常避免让外界以为他们代表的是中共，如果必须同巴共领导打交道时，也通常是以

① 《毛泽东年谱》（1956年9月2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635页。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年谱》（1959年10月2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225页。

④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58. 原始资料出自：Declaração de Wang Weizhen à delegacia da Ordem Policial e Social (Dops) do Estado da Guanabara (王唯珍向Guanabara州DOPS警察的报告), Arquivo Público do Rio de Janeiro, 3 de abril de 1964. (里约热内卢公共档案馆, 1964年4月3日)。

个人的身份会见。^①

可见，中国代表团在巴西时不愿意参与巴西政界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几年以后，巴西发生政变时，中国代表团仍持相同的态度，中国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员宋贵宝被巴西朋友告知，巴西政治动荡可能会导致很大的政权变化，但是宋贵宝表现这件事情与他无关，仅回复道：“我们和巴西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关系”。^②

关于新华社在巴西的工作，在其设立常驻巴西代表之前，曾雇佣两个巴西人负责报道巴西相关消息，这两人都是巴西共产党的干部。^③但根据常驻巴西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回忆，新华社对这两位巴西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提到“有一次他们发来一个电报，是巴西共产党的决议全文（……）当时感到这样的不行”^④，他们“不了解我们的需要”^⑤。新华社不需要巴西共产党的决议全文，可能是因为文件过长、电报费用十分昂贵，也可能是新华社需要巴西国家层面的消息，而非巴西共产党层面的消息。

关于巴中文化协会，这个机构的大多数成员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共产党的朋友。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化协会的创始人是巴西著名记者 Barão do Itararé（本名 Aparecido Toredly），他是巴西以幽默口才著名的共产党员，并曾担任过巴西首都议员。^⑥同样，巴西利亚中巴文化协会的名誉会长也是共产党著名人士，即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⑦

巴中文化协会经常依据会员的兴趣向中国所要文献，如国家宪法、毛泽东诗歌等等，供会员阅读；同时，也帮助一些巴西社会运动组织和工会索要来自中国的文献，例如巴西全国学生联盟的文化部门所要关于中国民间戏剧和木偶戏的书。^⑧在巴共的领导下，巴中文化协会和巴西各种民间组织联系中国。

然而巴中文化协会的主要活动仅限于国家层面，它举行的规模较大活动一般是以促进中巴两国政治关系为主。^⑨这说明巴中文化协会在巴共的协助下，配合中国推动民间外交政策，符合中国外交利益，但与巴西阶级斗争问题基本上是无关系的。

最终，巴西共产党与中国在巴西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持有一个共同理念：巴共希

①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② Guedes, Cíç;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16.

③ 王唯真、宗道一：《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党史博览》，2006年，第36。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笔者 2016年2月3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⑦ Diretori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de Brasília, 28 de abril de 1964（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主席，1964年4月28日）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131（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131页）。

⑧ Cart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à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Chino - Latin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26 de julho de 1963（巴西—中国文化协会向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致信；里约热内卢，1963年7月26日）。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114（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114页）。

⑨ 后文将举相关的例子作为证据。

望巴西能学习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开展巴中经济贸易关系可以帮助巴西推动国家工业化，正如巴西访华的八人妇女代表团团长 Maria Aparecida Pacheco 说，“中国人从前依靠手工业和原始型农业，现在却能够推动工业化，变成强大的国家。如此勇敢的斗争给全世界的人们上了一课。”^①同样，从巴西共产党配合中国民间外交的态度，可以看出巴共希望中巴加深两国政府间的经济交往，以便促进两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和政治同盟。

就中国而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开始批评苏联共产党对拉丁美洲的改良主义政策，但同时与巴西民粹主义政府加深联系。中国追求与巴西增长经济和文化交流，努力争取巴西政府的外交支持。总之，中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与巴共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一致的，两边是互相配合的。

三、民粹主义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挑战

民粹主义政权给整个工人运动带来了艰巨的挑战。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影响薄弱，民粹主义政府需要工人阶级的配合，也需要争取大众对它政府领导的支持。所以它一面采取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给民众提供物质的保护，一面控制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不让它超出国家的势力范围、镇压它的独立集团和政治指挥。例如，瓦尔加斯政府一方面出台了保护工人的措施，即假期的义务和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也出台了控制工会的措施，即开会时必须要有劳工部人员的参与和监督，只能在有部长的授权下从事工会工作，如果不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就无法设置工会，等等。同时，一部分工会成员也加入了政府机构成为咨询顾问，配合政府开展其工作。^②如此国家加强对工会组织系统的控制，还通过劳工法，拟定工人必须每个月交“工会税”给劳工部长，而部长将这些资金的大部分再次分配给工会。^③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因为国家有办法系统地控制国内的工人组织，而在国家控制范围以外的工人组织则难以生存。通过国家的协调，工人和资本家进行阶级合作，这就相当于资产阶级通过国家的手段领导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就成为它的一个零部件，这证明巴共采取的阶级合作最终是无效的。

民粹主义代表一种从上到下、垂直的、集中的政治力量，在这种统治下，工人阶级无法成为领导的角色，工人运动充其量只能给政府增加压力，很难在国家范围外发挥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独立空间有限，所以对抗资产阶级的能力也

① “who for a long time lived on handicraft and a primitive agriculture but have now carried out their own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 strong and given the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a lesson of struggle and heroism.” 可见：新华社（英文版），1963年7月3日，《Women Leaders Arrive in Peking》；新华社（英文版）7月14日《Speeches at Peking Rally - Brazilian Delegate on China's Example》，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94 à 296（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294至296页）。

② Fausto, Boris, *História do Brasil*,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2, p. 286.

③ Helena Hirata 《The Role of Populism in Brazil (1930-1960)》Notebook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p. 26.

比较弱。

此外民粹主义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也受到局限，使巴西附属于美国的控制下，而影响到了巴西外交政策。进口替代战略有效的增长国家的工业部门，如在 1949 年至 1961 年间，农业实际产值的增幅仅有 87%，但工业产值的增幅却达到了 262%，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50 年代期间，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并且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超过了农业。^①但这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即地区、部门以及社会阶层的分配不均，从而导致工业化所需要的国内市场远远不足^②。此外，经济的发展也没能使得巴西脱离对列强国家的依赖。

国家工业部门与列强的依赖关系不断的增长。在 1940 年至 1955 年之间，美国在巴西的加工制造业投资，从 6 千 9 百万增长到 5 亿 6 千 3 百万美元；在贸易部门的投资，从 1 千 8 增至 1 亿 5 千万美元；美国石油公司在巴西的财产资本金额，从 3 千万美元增长到 1 亿 6 千 8 百万。^③这些增长并非新的资本投入，它们随着资本流动而增长，通过巴西国内资本市场撤资来积累，继而导致巴西国内资源的流转。^④外国投资在巴西不仅无益于经济发展，还造成了资本流失。直到 1952 年，外国公司在巴西的投资总金额为了 9 千 7 百万美元，但巴西往国外输送的利润额为 8 亿 9 千万美元。^⑤

民族资产阶级试图扩展经济并推动国家的工业化，但不顾社会结构性障碍。可见巴西的土地所有进一步集中：根据 1950 年的数据，小农庄的总面积只占 17% 的生产土地，但承担了 85% 的农业劳动。此外，有 2 亿 3200 万公顷的土地没有用来从事生产工作，而仅仅属于投机财产。^⑥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还是国际垄断和金融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巴西不仅没有足够的力量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反而希望与美国加深关系。可见瓦尔加斯在 1953 年 9 月 7 日宣布“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因为富裕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还不充足，因此阻碍了贫穷国家的发展”^⑦。如此可见民粹主义政府并不是反对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是不满外国资本的缺乏。总之巴西试图扩大它的外交范围，进行所谓的独立外交政策，一方面有一定的独立特征，

① [美国]维尔纳·贝尔(Werner Baer).2014. 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第 77 页。

② 同上，第 83 页。

③ Sodré Nelson W.,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Editora Bertrand Brasil CA., 1987, p. 346.

④ “Esses capitais cresceram não por novas entradas e sim pelos lucros obtidos com as entradas primitivas. Cresceram pelo capital de movimento, recolhido em bancos que funcionam no país, ou pelo levantamento no mercado interno de capitais, nisso influenciando as sociedades estrangeiras de crédito, financiamento e investimento aqui instaladas e girando com recursos nacionais. Assim os capitais estrangeiros cresceram pelo acréscimo de capitais nacionais.”参见：Sodré Nelson W.,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Editora Bertrand Brasil CA., 1987, p.347.

⑤ Sodré Nelson W.,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Editora Bertrand Brasil CA., 1987, p.346. 出自 Comissão Mista Brasil - Estados Unidos. 1954. *Relatório Geral*. Rio de Janeiro, p. 100, V. 1.

⑥ Sodré Nelson W.,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Editora Bertrand Brasil CA., 1987, p. 351-358.

⑦ “O imperialismo era a falta de investimentos dos países ricos nos pobres, impedindo o desenvolvimento”. 参见：Vizentini, Paulo F.,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o Brasil, de Vargas a Lula*; Editora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08, p. 18.

但仍然依赖美国并竭力吸引美国的优越待遇。^①而中国通过民间外交，试图增长中巴经济和文化交流，以便争取巴西外交的支持，但没有能够改变巴西民资资产阶级对美国的服从地位。

① 二战结束之前，瓦尔加斯政府采取一种“讨价还价”的外交政策”，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该政策就是利用当时的国际局面争取美国的投资。巴西政府有效地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扩大经济交往。这一种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能够利用列强的竞争推动工业化。如巴西国家钢铁公司 CSN 在建立的过程中，原本准备接受德国的投资，后来却接受了美国更为实惠的投资。可见：Vizentini, Paulo F.,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o Brasil, de Vargas a Lula*; Editora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08, p. 17.

第三章 中国与中共对巴西的双重外交（1959-1964）

第一节 巴共的分裂及新巴共与中国的关系

一、巴共的分裂

1960年，巴共中央委员主席，若昂·阿马鲁、毛里西奥盖伯斯和 Diógenes Arruda，因为批判了巴共全国第五大会提出的方针，而被迫退出委员会。此后，在巴共内部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由遵从苏共新政策、以普列斯特斯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为首，另一个是由那些下台的领导为首。

1961年，巴共更名为“巴西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 以下简称 PCB），旨在避免与国际共运挂钩，希望外界认为这个组织仅关心巴西国内的问题，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无关。同时，巴共还抹去了纲领中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①它认为削弱世界革命的烙印能够更有效地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巴共越来越寄希望于无力的方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治权利。

1961年，若昂·阿马鲁、毛里西奥盖伯斯、Diógenes Arruda 等党员不满巴共的新措施，发表文章批判中央委员会委员，要求委员会重新召开一场全国大会，因此被开除巴西共产党。其后，他们在 1962 年和一批干部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派，使用了旧名字——巴西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以下简称 PCdoB）。这个新成立的组织采取的方针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巴共不一样。可见，传统共产党按照阶级合作政策，决定支持原巴西的劳工党领导古拉特于 1961 年起担任的巴西总统，而巴西共产党（PCdoB）则没有支持他。

二、新巴共与中国

巴西共产党（PCdoB）虽然还把苏联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②但实际上不断批评苏联的指挥，并在国际共运中逐渐疏远苏联共产党而接近中国共产党。

1963年7月14日，苏联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谴责中国在世界各国拥护共产党的分裂，其中还提到了 PCdoB，说该组织听从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主义。此后 PCdoB 给赫鲁晓夫致信，信中说“我们不能接受，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否认布尔什维主义的光荣传统，并在世界各地公开支持修正主义”，^③另外，还提到

①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43.

② 同上。

③ “Não podemos aceitar a conduta daqueles que, na direção do maior país socialista, renegam as gloriosas tradições do bolchevismo e apóiam abertamente os revisionistas em todas as partes do mundo. 可见：Resposta a Khrushchev.” 参见：Resposta a Khrushchev, 1963 年 7 月 27 日。

“最可恶的是，赫鲁晓夫一直对美国抱有好感，而同时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可后者发动了这一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并打开了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①最终在此紧张情况下，PCdoB 在 1963 年 6 月与苏联共产党断绝关系，而成为第一个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与苏联分裂的共产党。

PCdoB 掌握了中国民间外交在巴西的主要活动：新华社发表葡文版报道是由巴共老中央委员会主席帮他们做翻译和编辑。此人便是 Amarílio Vasconcelos，^②他在 1962 年退出了巴共，并与 PCdoB 保持友好关系。Amarílio 负责把新华社报纸送给 PCdoB 的主要领导人。^③

另外，中国代表团访问巴西时一般由 PCdoB 接待，所以九位中国人被逮捕时，PCdoB 的主要领导——毛里西奥盖伯斯、若昂·阿马鲁、Lincon Cordeiro Oest 和 Max José da Costa——同时也被公安部警察调查质问。此外，在六十年代初，Adão Pereira Nunes 议会议员担任了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化协会会长，他通过社会进步党（PSP）的名义做会员，但实际上他拥护 PCdoB。^④

巴中文化协会的主要工作一直都属于文化交流范围，但该机构在 PCdoB 的影响下，也开始承担更敏感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递工作。中国寄给巴中文化协会的书和刊物很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如在 1963 年初，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收到了以下几本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80 本）、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50 本）、列宁与现代修正主义（50 本）、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50 本）、分歧从何而来（50 本）。^⑤

PCdoB 受到了来自亲苏的传统巴共的多次冲击。在 1964 年的巴共 42 周年大庆会议中，党的总书记普列斯特斯指责该组织“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的分歧而进行

① “E o mais grave, ainda, é que Krushchev enquanto alimenta esperança nos imperialistas norte-americanos, ataca rudemente os comunistas chineses que dirigiram uma das maiores revoluções de nossa época e que iniciaram uma nova etapa na luta pela libertação das nações oprimidas.”参见：Resposta a Khrushchev, 1963 年 7 月 27 日。

② 他在 1962 年访问了一次中国，回到巴西以后他帮助过中国代表团在巴西筹备经济贸易展览。政变后他逃往乌拉圭，一年后和他的情人 Raquel Cossoy 前往中国，并一直生活到 1969 年。离开中国后，二人又于 1974 至 1978 年再一次回到中国生活。他们两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曾担任电台人员和北京大学葡萄牙语的教授。Raquel Cossoy 曾经也做过巴中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可见：Vasconcelos, José A. J., Daqing – Um Relato da Visita de Amarílio de Oliveira Vasconcelos, Inverta, 2016.另外可见：Guedes, Círculo;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83.原始资料出自 Heloísa Viggiani 访谈，2014 年 2 月 26 日；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63 和 1340 页。

③ Buonicore, Augusto, Meu Verbo é Lutar – A Vida e o Pensamento de João Amazonas,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174.

④ Divisão de Informações do Departamento de Segurança Pública do Estado da Guanabara - Departamento de Ordem Político e Social（瓜纳巴拉州公安部，信息部门），第 0059 号，1969 年 1 月 17 日。另外：致信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1964 年 3 月 3 日；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93 页。

⑤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amonos para Luchar Contra Nuestro Enemigo Común、Las Divergencias entre el Camarada Togliatti y nosotros、El Leninismo y el Revisionismo Contemporáneo、Unamonos Sobre la Base de las Dos Declaraciones de Moscú、De Dónde Precede las Divergencias.”参见：Carta à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Beijing, 14 de março de 1963（《向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致信》，北京，1963 年 3 月 14 日）。出自：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88（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88 页）。

分裂”。^①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之所以国际共运中有分歧，是因为中国同志不懂在现今世界如何使用马列主义。^②一年前，普列斯特斯访问古巴时，顺便拜访了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向他们表达了对北京广播电台葡萄牙语部传播支持退出巴西共产党的组织、新华社散播这些组织批准的文章的不满。^③

尽管如此，传统巴共与新巴共（PCdoB）的矛盾焦点初期更多地集中于两个组织关于党的纲领、党对社会运动的战略、党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方面。传统巴共与中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微弱联系，如普列斯特斯特给毛主席的祝寿信。^④而新巴共虽然已经与苏共分裂，但也并没有立即将中共视为主要盟友。然而，新巴共与中共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表明中国对巴西共产运动的影响不那么微弱，尤其是对于巴西极左（比传统巴共更激进）的组织。

三、巴西左翼组织与中国

1) 农民联盟

除了巴共（PCdoB）以外，还有另外一些组织同样与中共加深了联系，其中有巴西广大的农民联盟。该组织在 1961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届国家代表大会中，有若昂·古拉特的积极参与，不过随后该劳工党领导担任总统时，没有享有农民联盟的政治支持。农民联盟的主要领导，Francisco Julião 的口号是“如果土地改革无法通过立法过程实现，那我们只能通过武力方式实现”。^⑤Julião 在 1961 年 1 月加入了巴西律师工作者代表团访华——他之所以参加该代表团是因为他本来没有农民身份，他原来在巴西东北伯南布哥州做律师。^⑥Julião 的夫人，Alexina de Paula 女士及其两个女儿，通过中拉友好协会的邀请在 1962 年 6、7 月也访问了中国。她们在中国期间会见了各位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约定了在后期要派送农民联盟干部赴中国参加培训。^⑦

农民联盟是巴共在 50 年代共同帮助成立、也积极参与的组织。但随后巴共成员开始提倡比较温和的战略以及不超出国家管辖范畴的政策。从此农民联盟与传统的巴

① “Prestes criticou o grupo de Grabois julgando que ele explorava as divergências do movim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quando estas tinham caráter apenas transitório”。巴西共产党 42 周年大庆会议，位于巴西新闻协会大厅，里约热内卢，1964 年 3 月 25 日。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31 页。

② “As divergências existem porque os camaradas chineses não sabem aplicar o marxismo leninismo à situação concreta do mundo atual”。巴西共产党 42 周年大庆会议，位于巴西新闻协会大厅，里约热内卢，1964 年 3 月 25 日。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31 页。

③ “Comrade Prestes, during his stay in Cuba, also visited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on behalf of the party, expressed outrage that Radio China, in Portuguese, supported splinter groups that were ejected from the Party and that the Chinese agency Xinhua spread articles and newspaper reports from this group. In addition,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 Brazil will specially raise the problem in Beijing.”参见：Letter to Walter Ulbricht on the Brazilian Communist Party, 1963 年 3 月 9 日（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

④ 中央联络部收电，联收 42 号，《巴（西）共主席给毛主席祝寿信事》，1964 年 1 月 9 日。

⑤ “Reforma agrária na lei ou na marra”

⑥ “Francisco Julião e as Ligas Camponesas”，*Standeteu.wordpress*, 30 de outubro de 2009.

⑦ Despacho-telegráfico, nº 4682 do Consulado Geral do Brasil em Hong Kong, de 4 de julho de 1962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电报 4682 号，1962 年 7 月 4 日)。

共遇到了不少的分歧。例如，在 1961 年召开的第一届农村工作者全国大会中，Francisco Julião 领导主张国家没收大农庄进而分配土地，巴共干部却主张向农民普及劳工法并推广正式的农村工作者协会。^①

2) 人民运动

另外，还有一个组织称为“人民运动”，它是指挥天主教左翼少年团的组织，在 1963 年 2 月建立。虽然该组织的成员不多，但是它发起了大部分学生运动，而且领导学生会。一批人民运动领袖担任了巴西全国学生联盟（UNE）的主席。后来，因为巴西全国天主教会不允许天主教左翼少年在学生中占有席位，所以人民运动从教会中独立出来。六十年代，在巴西社会运动浪潮的背景及古巴革命的影响下，人民运动逐渐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更倾向于革命的政治纲领。

1963 年，人民运动通过巴西全国学生联盟在萨尔瓦多市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研讨会。当时中国有 Chu Liang^②率领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参加，^③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和中国接触。^④随后在人民运动演变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成为了人民运动的主要国际参考，可见在该组织发布的文章中经常提到毛泽东、格瓦拉和阿尔都塞。^⑤

3) 巴西全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和巴西公务员联合会

中国与巴西工人运动也加深了联系，如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该组织的副会长在 1960 年访华。^⑥接下来，两国工会又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例如 1962 年 8 月，中国代表团赴巴西出席第四届巴西工人大会，中国来宾参观了巴西各地工厂还联系到各工会领导，包括巴西全国产业工人联合会（CNTI）。^⑦而 CNTI 之后也组织了其他巴西工人代表团访华。^⑧中国也派出其他代表赴巴西参加各类活动，例如 1963 年 7 月，Fang Ming^⑨教授和翻译员受到巴西教师工会的邀请，出席巴西国际教师会议。^⑩访问巴西的中国代表团大多数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该机构在 1962 年 4 月底派代表团赴里约热内卢参加第二届巴西产业工人大会。¹¹该代表团成员在巴西会议上说，“最近几年，我们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工会的团结都在不断加强，并且两国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中国工人和人民都热烈欢迎来访的巴西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包括许多工会

① Fausto, Boris, *História do Brasil*,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2, p. 379.

② 由于档案资料来自巴西，原文为葡萄牙语，所以此处为拼音。

③ 巴中文化协会，1963 年 11 月 29 日大会的报告。出自：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82 页。

④ Figueiras, Otto, *Revolucionários Sem Rosto: Um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 (Vol. I) Primeiros Tempos*. Instituto Caio Prado Junior, 2014, p.328.

⑤ Paulon, A. C., “Entre o Rosário e as Armas: A Ação Popular e a Questã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 (1965-1968)”. Londrina: ANPUH – XXIII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5, p.6.

⑥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电报，4394 号，1960 年 5 月 19 日。

⑦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98 页。

⑧ Peking Review 报刊，1963 年 5 月 20 日，Brazilians visiting China.

⑨ 由于档案资料来自巴西，原文为葡萄牙语，所以此处为拼音。

⑩ 巴中文化协会，1963 年 11 月 29 日大会的报告。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82 页。

11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59 页。另外：巴中文化协会，1963 年 11 月 29 日大会的报告；参见：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82 页。

朋友。”^①

4)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派

这个组织主要由劳工党著名领导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和一批军士长官于六十年代中旬建立。1961年5月16日，时任南大河州州长的布里佐拉，会见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②当时他也支持了中国代表团在省会阿雷格里港市议会举办的一次演讲。^③1964年政变以后劳工党几乎瓦解，而这位领导逃往乌拉圭。随后，布里佐拉受到了古巴革命浓厚的影响，组成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决定要像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开辟游击战一样，在Caparaó山区也从事游击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的前一年即1965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派了代表团访问中国。^④但关于此次访问的成果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可以查阅。

第二节 中苏分裂与古巴革命的影响

一、中苏分裂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期间批准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九篇文章，全面分析和批判了苏联的内外政策。中共不赞成苏联共产党在第三世界的做法，指责赫鲁晓夫试图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变成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⑤中共还批判巴西的修正主义，引用巴共（PCdoB）有关修正主义的评论，在英文刊物Peking Review刊登了不少巴共的文章。可见，中国赞成和支持巴共（PCdoB）对巴西的修正主义所持有的观点，如：

“修正主义的实践活动只限于适当资产阶级要求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巴西的]修正主义接受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即以为在美国帝国主义范围内存在民主的一面，而能够保卫和平。在若昂·古拉特执政时期，尤其在此时期的最后几个月，修正主义甚至把这位巴西劳工党的领袖作为主要盟友。”^⑥

① 巴西全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召开的第二届巴西产业工人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出自：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187页。

②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76页。原始资料出自：Jornal do Brasil报刊，1961年5月17日。

③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号、第5页。

④ Buonicore, Augusto C., “Capítulos d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2ª Parte)”, Fundação Mauricio Grabois, 12 de setembro de 2014.

⑤ “The Khrushchov revisionists tried in vain to impose their capitulationist and divisive line on the conference and to bring the national-democratic movement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to the orbit of U.S.-Soviet collaboration for world domination.”参见：Peking Review报刊，1966年1月21日，第16至18页。

⑥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 revisionists limited the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to the extent that it suited the bourgeoisie. They accepted the view of the C.P.S.U. that there supposedly existed within U.S. imperialism a democratic grouping which would uphold peac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Joao Goulart was in power, an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of the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y even regarded this leader of the Brazilian Labour Party as their principal ally.”参见：“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Brazil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razil”, Peking Review, 第22号，1965年5月28日。

六十年代早期,中苏分裂对中巴关系的影响已开始超出党见分歧,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和苏联两国在巴西的活动。从此中国的民间外交不会再得到苏联使馆的配合和帮助。可见在 1964 年,九位中国人被巴西警察逮捕,巴西律师丹尼路·桑托斯设想援护他们,而寻求苏联驻巴西大使馆的配合,但苏联大使馆说他们所有人都生病了,不能提供帮助。^①最终古巴驻巴西使馆给九位中国人提供了外交援助。其次,根据新华社和巴西报社的报道,苏联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中,都提出反对向巴西政府要求释放九位中国人。^②

二、古巴革命的影响

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积极影响,掀起了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浪潮,正如毛泽东所承认的“古巴革命是有世界意义的,对整个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影响”。^③

古巴共产党给拉美各国的许多左翼组织提供了支持。就巴西而言,有记载表明古巴给各个巴西组织提供了武装培训、政治指导、物质资助和声援,其中有农民联盟、Caparaó 山游击队、马里格赫拉领导的全国解放运动、10 月 8 日革命运动(MR-8)、人民革命先锋(VPR)、工人革命党(PRT)等组织。^④

古巴经验给拉美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正如毛泽东给卡斯特罗主席致信时说,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⑤从此,一部分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组织放弃了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思维,至六十年代,整个拉美大陆拥有大约 50 个中大规模的游击基地。^⑥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革命道路也开始抱有更大的希望。在 1963 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八届美洲教育工作者大会上,一名中国来宾说:“我们能看出来最近几年,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掠的斗争,全面地日益增强。”^⑦

古巴革命使得中共有机会加深对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理解。从此中国更清楚地知

①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② “Russos não se unem ao protesto contra a prisão dos nove chineses”, *Jornal do Brasil*, 1964 年 5 月 20 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60 年 5 月 10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91 页。

④ 该组织成立于 1964 年,之后为了纪念切·格瓦拉在 1967 年 10 月 8 日被暗杀,取名为《10 月 8 月革命运动》。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60 年 5 月 30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406 页。

⑥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E. Bradford Burns)、朱莉·阿·查利普(Julie A. Charlip):《简明拉丁美洲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年 9 月,第 281-284 页。

⑦ “Durante los últimos años, articuladamente a raíz de la victoria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crecen día a día las luchas de los pueblos latinoamericanos por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completa, contra la intervención y saqueo del imperialismo norteamericano”。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188 页;参见:Mensaje de Saludo al VIII Congreso de Educadores Americanos(第八届美洲教育工作者,中国代表团的贺词)。

道，拉美民粹主义政权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愿望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例如，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拜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说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封建势力，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切·格瓦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会向其他国家要求更高的进口税以保护国家工业，但“并没有站在国家利益的一边，实际上，该阶级是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①在两国领导的对话中，毛泽东还问了巴西钢铁工业在资金方面是否与美国有联系，而切·格瓦拉回应道：“巴西主要冶金工厂是由美国资金建立的”。周恩来说，巴西每年生产 160 万吨钢铁，便询问古巴领导“美国的资本比例是多少”。格瓦拉说资本总量不太清楚，但“在技术方面完全依靠美国，巴西是一个大国，但其实它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差异不大。”^②

因此，中国开始更加关注和支持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拉美国家随后发生的大规模革命斗争都曾受到中国的声援，如 1964 年巴拿马的反美风暴和 1965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进行反美武装斗争等都得到了中国的公开支持。毛泽东曾发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讲话^③，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分别致电巴拿马总统，表示支持巴拿马人民斗争。^④毛泽东也曾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表示支该国人民的独立民族的斗争。^⑤

中国开始加强对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说明中国对拉美地区更有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拉丁美洲史组，1961 年 7 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先后归属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中国还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拉丁美洲史的机构，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学校的历史系，相继成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历史系，也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⑥1949 年至 1966 年，中国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有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问题研究的专著、译著、学术论文等文献达到 445 篇（部）。1950 年至 1958 年间，中国发表了 115 篇文献，而在 1959 年古

① “In order to destroy feudalist forces, imperialism fostered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may have also asked for a higher import tax. But they did not stand for national interests; they were, in fact, colluding with imperialism.”参见 Wilson Digital Archive Cent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Ernesto ‘Che’ Guevara”, 1960 年 11 月 19 日。

② “Chairman: I have a question. Is the Brazilian steel industry connected with the US in terms of capital? Guevara: Major Brazilian metallurgical factories were founded with American capital. Premier [Zhou Enlai]: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American capital? Brazil produces 1.6 million tons of steel [annually]. Guevara: The overall amount of capital for the largest Brazilian factory is not quite clear. But technologically, it entirely depends on the US. Brazil is a big country, yet there is actually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参见 Wilson Digital Archive Cent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Ernesto ‘Che’ Guevara”, 1960 年 11 月 19 日。

③ 毛泽东：《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964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④ 王翠文：《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期，2011 年。

⑤ 毛泽东：《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965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567 页。

⑥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35 页。

巴革命胜利后的七年里，数量则增长到几乎三倍多（330 本），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献（111 本）是直接和古巴相关的。^①

此外，古巴革命爆发以后，中国有效地扩大了在拉丁美洲的行动路线，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党之间的关系都有所改善。譬如中古建交以后，中国访问拉丁美洲的代表团就可以顺路经过古巴，也可以在古巴会见巴西的各界人士。由于古巴变成了拉丁美洲左翼组织集合的地方，这也打开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渠道：中国通过大使馆或代表处，更容易联系到来自拉丁美洲的组织。^②可见，巴西共产党 PCdoB 建立后，初次会见中共领导就是在 1962 年 2 月的哈瓦那宣言大会。^③另外，还有一系列国际会议在古巴召开，中国共产党在会议中也联系到了不少组织。

第三节 官方关系的发展与民间交往的改善

一、官方关系的发展

虽然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中苏分裂和古巴革命的影响，而开始支持巴西最激进的左翼组织进行颠覆活动，但中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此在 1959 年至 1964 年期间，中巴关系的最大的进展不在于阶级层面，而在于国家之间。无论是民间交往还是国家外交关系都有显著的发展，这段时期也是中巴关系发展的最好时期。

此事发生的原因更多的是基于巴西民粹主义政府的变化：巴西民粹主义政府的政治凝聚力和经济模式纷纷走到了尽头。从政治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如社会的极进化，民粹主义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操纵左翼和右翼力量，反而遭受了两者的压力。从经济方面来讲，由于外资的缺乏和工业的衰落，至六十年代，巴西经济开始面临各种瓶颈。在这种环境下，民粹主义政府开始竭力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推动更为独立的对外政策。

所以在 60 年代初，巴西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重建了外交关系，也公开反对美国干涉古巴（猪湾事件）。接任库比契克的新巴西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在 1961 年 5 月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同年还接待了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以及古巴经济部长切·格瓦拉。巴西开始提倡独立外交政策，主张与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从此中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61 年，巴西派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在华期间，代表团会见了朱德委员长和陈

① 笔者根据孙桂荣编著的中国对拉丁美洲研究文献 (1949-2014) 计算所得。

② Rothwell, D. M.,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 21.

③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47, 54, 55.

毅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等领导，并告知他们巴西政府有意与中国增加贸易往来。^①为回应巴方的好意，一个月后，中国国际商会主席南汉宸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

中国代表团在巴西得到了夸德罗斯总统的认可，允许中国在巴西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像此前批准苏联一样。^②他也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巴西建立常驻代表处，^③像东德之前在巴西建立的一样，并批准巴西在华建立代表处。^④夸德罗斯总统接见南汉宸时表示：“巴西政府正在推行新的政策，也就是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也包括中国”。^⑤

中国贸易代表团在途中还获悉一些巴西高官希望与中国发展更进一步的政治关系。如访问里约热内卢时，中国代表团会见了州长和州政府的内政秘书、财务部秘书和教育部秘书。Celso Peçanha 州长告诉他们，他一直都努力让巴西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表示“很佩服的毛泽东”，想拜访这位领导人。^⑥

中国贸易代表团在里约热内卢也会见了巴西副总统古拉特，并转交了中国副总统董必武的一封信，邀请他访问中国，^⑦这是因为古拉特一年前在捷克和苏联时，曾表示过希望有机会能访问中国。^⑧

巴西官方政界对中国表示好感的言论，增加了中国政府对中巴关系的期待。因此，1961 年古拉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古拉特在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欢迎。当他抵达北京时，董必武、陈毅、李先念等有关各方领导 50 余人，以及群众 200 人于机场列队欢迎。^⑨北京市和中拉友好协会还联合举行了一场万人群众欢迎大会。

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会见古拉特时，都高度赞扬古拉特此次访华对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如刘少奇对他说：“亚洲、非洲、拉美、拉美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很重要，我们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关系。我们也愿意同拉美各国建立关系，先建立民间关系也好，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⑩毛泽东也向古拉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

①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42、43 页，177 页。

② “Governo resolve permitir mostra da China Comunista”（《政府决定批准共产党中国举办展览》），*Jornal do Brasil*，1964 年 3 月 18 日。

③ 同上。

④ 王唯真、宗道一：《1964 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党史博览，2006 年，第 36 页。

⑤ 朱祥忠：《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党史纵横，2007 年，第 2 期。

⑥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 34.582 p. 56（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70 页）。出自：Jornal do Brasil 报刊，1961 年 6 月 28 日。

⑦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177 页。

⑧ 朱祥忠：《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党史纵横，2007 年，第 2 期。

⑨ 同上。另外可见：《加强中巴人民友谊，发展巴西两国关系》，《人民日报》，1961 年 12 月 14 日。

⑩ 朱祥忠，2007 年。另外可见：《刘少奇主席接见古拉特副总统》，《人民日报》，1961 年 12 月 15 日。

说中国与巴西“从贸易关系开始，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望你们。我要去看望你们的总统，向巴西人民问候。”^①

相比之下，古拉特的态度比中国政府领导要谨慎一些。他在华的第二天会见了周恩来，谈到“希望总理理解我们在国内所处的困难，这种困难使我们不能建立直接的关系”。^②中国政府将古拉特造访视为官方访问，只不过由于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古拉特没有以政府官员身份，而是以劳工党主席的身份访华。

尽管其以劳工党主席而非副总统身份访华，古拉特副总统的访问仍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大大促进了中巴关系发展。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赴中国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在拉丁美洲外交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陪古拉特一起拜访中国有 22 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议员、企业家、外交部代表和巴西银行代表。此代表团与中国领导人商定两国互派贸易代表团，巴西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支付和贸易协定。^③古拉特在访华时还特别授权新华社在里约热内卢开分社。^④当时跟古拉特一起访华的外交部代表 João Augusto de Araújo Castro，在 1961 年 8 月 23 日发电报给巴西外交部，授意新华社在里约热内卢开分社。1963 年，Araújo Castro 担任巴西外交部长时，曾写信给王唯真和鞠庆东两位新华社记者，表示“我确定二位一定会努力推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⑤

古拉特副总统访华时，夸德罗斯总统利用此事件来诋毁其声誉。虽然夸德罗斯在外交方面提倡独立外交政策，但在国内他属于保守派，所以他和劳工党的古拉特副总统关系并不和谐。因为国家经济处境困难、政局不稳以及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不一致，夸德罗斯同时遭受了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所以，他认为辞任有助于获得国民对他的支持并摆脱孤立的状况。夸德罗斯等古拉特前往中国之后立即决定辞任。由于巴西与中国距离很远，加上新中国的舆论地位低，所以他相信，国民不会接受古拉特回国后担任新总统。但夸德罗斯辞职并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结果，古拉特从中国回来一周后就成了新的国家总统。

此后，两国代表团互相访问而制定的协议开始部分生效。中国外贸部向里约热内卢派出一个五人筹备小组寻找适合举办展览会的场地。^⑥1964 年初，从墨西哥赴巴西的三人代表团也加入其中，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王耀庭为

① 朱祥忠：《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党史纵横》，2007 年，第 2 期。

② 同上。

③ 朱祥忠：《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党史纵横》，2007 年，第 2 期。

④ 新华社于 1962 年 12 月建立驻里约热内卢分社。

⑤ Exmo. Sr. João Augusto de Araújo Castro; Ministério de Relações Exteriores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27 de agosto de 1963 (Araújo Castro 先生，巴西外交部，里约热内卢，1963 年 8 月 27 日)。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52 (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52 页)。

⑥ 他们在 1963 年 6 月到达里约热内卢。参见 Guedes, Cíçã;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deira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49.

团长。^①王耀庭曾于 1956 年 1 月受巴西合义公司邀请，以中杂公司经理的身份前往巴西购买巴西棉花。^②除洽谈购买巴西棉花以外，他还帮助其他代表团举办经贸展览会。

1964 年，中国代表团赴巴西帮助建立长期商务代表处，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了新总统。古拉特表示，国民党在巴西建大使馆仅仅是出于外交礼节，并不重要，而中国在巴西“建立商务代表处是一件好事，这才很重要。”^③关于中巴关系他认为：

“将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中巴关系，包括在外交方面。我采访中国时很惊喜，周恩来总理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特别出色，未来的世界必须要听从他说的话。陈毅很老练，非常优秀，哪天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他来访问巴西。中巴建交以后我可以再次访华。”^④

中巴两国政府的接近获得了一定成效。中国与巴西的贸易交流有了一定的进展，可见两国进出口贸易规模虽然不大，但与台湾和巴西的贸易往来规模相比还是略胜一筹。就 1960 年和 1961 年而言，巴西向中国出口的贸易总额分别为 1,635,497 美元和 4,884,486 美元，出口至台湾的贸易总额分别为 1000 美元和 795,001 美元。

二、民间交往的改善

从新中国建立到 1964 年的巴西军事政变，两国的民间联系不断加强，而由于六十年代初巴西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这些联系达到了顶峰。就拉丁美洲国家而言，访问中国的人数大幅增长：根据中国外交部统计，截至 1960 年 7 月，有来自拉美各个国家的访华人数达到 1388 个，其中有 515 名是在 1959 年以后访华的。^⑤巴西的访华人数也有所增加，仅从 1960 年 4 月到 1961 年 4 月这一年的数据来看，至少有 25 个代表团曾访问中国，其中包括律师、记者、医生、议员、艺术家等代表团，包含国家最高法院院长、里约热内卢银行主席、果亚斯州州长、巴西内政部长 Kubitschek、和著名历史学家 Caio Prado Junior 等。^⑥

① 王唯真、宗道一：《1964 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党史博览》，2006 年，第 36 页。

② 王玉贵：《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国共产党为视角》，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35 页。

③ “Dia 3 de março de 1964; Goulart recebeu Wang Yaoting na Laranjeiras para almoço. Senador Dix-Huit Rosado e Sr. Maia foram presentes”（1964 年 3 月 3 日，在 Laranjeiras 办公室，古拉特与王耀庭一起吃了午餐。Dix-Huit Rosado 参议员和夫人 Maia 女士在座）。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33（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33 页）。

④ 同上。

⑤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⑥ Telegramas entre Consulado Geral dos Estados Unidos do Brasil e Secretaria de Estad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1960/1961（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电报，1960 年 / 1961 年）。

中国新闻传播在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有了显著的进步。可见新华社驻里约热内卢分社通过与巴西人合作,在 1963 年将西班牙语版的新华社报纸翻译成葡萄牙语版。除了发表葡文报刊以外,新华社记者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给大众报道新闻事件,二是为国家搜集信息撰写内刊。^①驻巴西的两名新华社记者在两年时间里撰写了大约七百份报告。^②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的对华协会数量也有明显增长。五十年代成立的 11 个友好协会,其中 7 个是 1958 至 1960 年期间成立的。^③为了协助各个国家友好协会的工作,1960 年 3 月,在北京东四三条 14 号,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刘宁一和楚图南先后当选为第一任和第二任会长。^④

中拉友好协会鼓励扩大巴中文化协会,支持在巴西不同地区开设分会。^⑤中拉友好协会负责寄送材料给巴西,1963 年 4 月,应巴中文化协会请求,中拉友好协会给巴西十个不同城市寄送了材料。^⑥除此之外,中拉友好协会也从巴中文化协会获得了许多材料,包括书本、报刊和电影。^⑦中拉友好协会还资助和支持巴西人士访华,通过巴中友好协会推荐的人,^⑧可以享受中拉友好协会提供的往返中国的机票。^⑨

1963 年,巴中文化协会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开设了固定的办公室,从当年 5 月开始,该办公室在 14:00-19:00 对外开放。^⑩此外,巴中文化协会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不乏许多著名人士。1959 年 10 月到 1961 年 5 月,巴中文化协会举办或支持了 17 场关于中国的讲座,一般都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电影的展览,大约共有 9450 人参加。¹¹该电影在 Roquete Pinto 电台大厅被放映了 4 次,巴

① 新华社国际部资料粗编,拉美各国政党简介,拉丁美洲研究所档案馆。

② 王唯真、宗道一:《1964 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党史博览,2006 年,第 32 页。

③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④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4 页。

⑤ Carta à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Sino-Latin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6 de maio de 1963 (巴中文化协会致信中拉友好协会,日月热内卢,1963 年 5 月 6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61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61 页)。

⑥ 同上。

⑦ 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北京东四三条 14 号,电报挂号:ACHLA,1960 年 6 月 7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47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47 页)。

⑧ Carta da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à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Chino - Latin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1 de março de 1961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向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致信;里约热内卢,1961 年 3 月 1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40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40 页)。另外可见: Sociedade Cultural Sino-Brasileira, 5 de abril de 1963 (巴中文化协会,1963 年 4 月 5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56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56 页)。

⑨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致信 General Gilberto Alvim, 里约热内卢,1964 年 3 月 18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79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 34.582 号、第 279 页)。

⑩ 办公室地址: Senador Dantas 街, 117 号, 1942 室;参见: 巴中文化协会, 里约热内卢, 1963 年 5 月 28 日;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77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 1965.3.5, 34.582 号、第 277 页)。

11 Material recebido dia 6 de março de 1964 (1964 年 3 月 6 日收到的材料);出自: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119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 1965.3.5, 34.582 号、第 119 页)。

中文化协会还把该电影寄到了米纳斯州和南大河州，在这两州的许多城市放映，仅在南大河就有 5000 人观看过。^①

1961 年，南汉宸带领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时，也接受到巴中文化协会的邀请。接风晚宴在巴西报社协会总部举行，有近 500 人出席，其中包括外交部代表、里约州政府代表、里约前任州长、国家最高法院法官、众议院官员、工会主席、以及巴共主席普列斯特斯和著名的巴西画家 Di Cavalcante。^②

1964 年 2 月 19 日，巴中文化协会在国家教育文化部举行任职大会。根据协会的报告，该大会有 700 人参加。^③会议中，巴中文化协会首任主席 Barão do Itararé 分享了他访华的经验。协会会长、众议员 Adão Pereira Nunes 对此前巴中文化协会开展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进行了报道。^④当时 Pereira Nunes 会长给巴西总统古拉特寄了一封信，要求巴西立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最近有众多巴西人造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政治和社会的复兴，尊重人道主义的伟大人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阁下也去过中国，也见证了当地人民的勤劳与诚恳，他们不断在进步……所以我们请求总统阁下立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⑤

三、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干涉

拉丁美洲的政局不稳和社会矛盾激化，使得美国对这些国家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并对它们施加压力。美国及其各国的“代理人”设法阻止中国与拉丁美洲人民发展关系，许多拉美国家政府开始更加排斥中国，譬如在 1959 年 4 月，墨西哥撤销了发放给中国杂技团人员的入境签证，并限令杂技团前期人员离境。^⑥墨西哥给的借口是，基于中国代表团之前访问波哥大时，被哥伦比亚警察发现了“八箱反动宣传文献”。这八个箱子是否是中国代表团带过去的，还没有人证明过，箱子里有什么样的

① Conferências patrocinadas pela sociedade, ou em colaboração com a sociedade, de 1 de outubro de 1959 até maio de 1961 (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举办或支持会议，从 1959 年 10 月 1 日至 1961 年 4 月)，参见：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200, 201（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200、201 页）。

②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56（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56 页）。

③ Correspondência para a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Sino-Latino Americana; Rio de Janeiro, 3 de março de 1964（致信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1964 年 3 月 3 日）。出自：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93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93 页）。

④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38（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38 页）。

⑤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p. 829（巴西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829 页）。

⑥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资料也没有记载可以证明，但此事件成为禁止中国代表团访问墨西哥的借口。^①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共青团国际联络部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在 1961 年 5 月访问了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但代表团到厄瓜多尔时被厄警方非法拘捕 5 天，尽管中国代表团是应厄瓜多尔革命青年联盟的邀请前往，并都持有签证。^②此外，在同一年，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乌拉圭时，险些被该国当局驱逐。另外，中国外交信使在赴古巴的途中，在库拉索岛被美国特务试图绑架。^③

美国对中巴民间外交也加剧迫害，甚至贸易关系也成为美国外交担忧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中国战略需求的产品，如原子弹原料。巴西政变之前（1961 年），黄志良描述他随五人代表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辰带领）访问巴西时，在里约热内卢住的宾馆大门被一个“彬彬有礼的”陌生人打招呼，此人“带着浓重的英语腔的西班牙文”口音，自称是一家巴西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要跟代表团“喝咖啡，坐下聊聊”，谈笔向中国出售铀的生意。黄志良谢绝了他的邀请，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分析后认为有情报机构想要试探中国代表团是否有意图向巴西购买制造原子弹的原料。^④

拉丁美洲政治局势改变以后，美国更加支持这些国家的军队和反共派进行政变，甚至直接侵犯拉美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古拉特为代表，失去了一定的行动空间。随后，在外交方面巴西政府不断对于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妥协，疏离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减少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交流，取消了原本要在里约召开的支持古巴的国际大会。

由于美国的迫害和压力，中巴关系也受到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台湾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交流方面，都努力改善与巴西的关系，而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对巴西的影响力。可见古拉特访华时，台湾政府也邀请了他顺便访问台北。古拉特虽然没去台湾，但他一担任总统后就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了贸易协定。^⑤在古拉特执政时间，台湾当局一直干涉巴中关系。例如，新华社在巴西开分社时（1962 年），台湾驻巴西的商务代办向巴西外交部表示担忧；1963 年 11 月，台湾还向巴西外交部发了一个备忘录（外交文件），请求“为了巴西国家利益和自由世界的利益，”拒绝新华社记者巴西延续签证。^⑥

因为美国和台湾的压力，1961 年，巴西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中国，要

① 巴西驻台北大使馆致电巴西外交部，1960 年 7 月 20 日，《Propaganda e infiltração da China comunista na América Latina》。

②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64 页。

③ 《国际简讯》，《人民日报》，1961 年 5 月 5 日。另外可见：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64 页。

④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48-49 页。

⑤ 里约热内卢州对外部门档案，1960 年 11 月 30 日，DC/DPo430.1(42)(00)，11.285 号。

⑥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5/3/1965; N°34.582, folha 1240（军事最高法院，1965.3.5，34.582 号，第 1240 页）。

求联合国大会商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但当中国方面达到初步胜利后，美国立即要求联合国需要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接受北京替代台北的席位，而巴西政府居然投票支持美国的要求。此外，巴西银行与中国银行签署协定以后，两国贸易并没有实现原本预料中的大幅增长。^①另外，由于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障碍中国要求推迟原本计划要在 1961 年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该展览会本该在里约热内卢市举办，但因为里约市长是保守右派，所以只能改到其他地方。^②——改期以后展览会还受到了巴西外交部和地区政府的反对与刁难。^③

展览会原来打算由上百个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在巴西展出五千六百件中国商品，但最后都没有付诸实施。^④此外，前文曾提到受夸德罗斯前总统与中国代表团曾经商定两国互相建立常驻贸易代表处，可是巴西从来未曾筹备此事，而中国由于巴西政局也没有办法建成。

1964 年，在美国加大政治压力以及国内社会政治激荡的背景下，古拉特政府最后遭遇了美国在幕后指挥的军事政变。政变发生的同一天（3 月 31 日），巴西驻日内瓦领事馆为九名中国人组成的代表团签发了赴巴签证，其中有四人负责筹备经济贸易展览会，另外五人负责管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巴西开设的代表处。当时他们九人已经持有前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但由于政变造成的政局不稳，迫使他们取消了此次行程。^⑤同时，已经在巴西的九位中国人，两个代表团和新华社分社记者，被里约热内卢州公安部逮捕了。

四、中国的双重外交

如上文所讲，直到 1964 年政变，中国一边改善与巴西政府关系，一边与巴西共产运动加深了联系。大多数支持中国的巴西组织批评巴西传统共产党的阶级合作政策，认为巴共不应该把古拉特总统当做主要的盟友。中国政府虽然在公开舆论上支持此类观点，但也非常乐观地看待古拉特，努力争取巴西政府。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进行不同政治取向的双重外交是否对每一边都产生了负面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中国同巴西的关系，无论在政党层面还是在国家间层面，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中巴两国无法进行有机配合，更不用说建立外交关

① *Relações Comerciais Brasil-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巴西—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关系），参见：*Viagem do Senhor Horácio Sabino Coimbra à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Horácio Coimbra 先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自：Consulado Gerla do Brasil, Hong Kong, à *Secretaria de Estado da União*, 1 de novembro de 1971（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1971 年 11 月 1 日）。

② Carlos Lacerda 是全国民主联盟(UDN)的主要领袖，他激烈反对古拉特也反对共产党。

③ Guedes, Cígar;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48-59.

④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⑤ Guedes, Cígar;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67.

系，同样中共与巴西共产运动暂时也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同盟。

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无法判断巴西是否对中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提出意见，也无法推测巴共对中巴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提出意见。与之相反，巴共希望中国能得到巴西的外交承认，并利用巴中文化协会帮助两国政府有更频繁的接触。巴西政府虽然一直未曾允许两个巴西共产党（PCB 和 PCdoB）合法化，但却认可巴共（PCdoB）所组织的中巴民间活动。

假如中巴共产党或中巴两国政府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事情有可能就会不像原来那样发展，但当时巴西的特殊政治局面给予了中国一定的空间，使其一边配合巴共（PCdoB）加强颠覆活动，一边通过巴共（PCdoB）的帮助来接近古拉特总统，反之亦然。

第四章 中国对巴西外交的激进化（1964-1969）

第一节 巴西政变与中巴关系

一、巴西政变的影响

巴西军队在美国的干预下发生了政变，从此花费了二十年时间的守护独裁政权。新政府通过“国家安全教条”（Doutrina de Segurança Nacional）将国内的反政府活动定义为颠覆国家安全，从而残酷地镇压和残害共产主义运动及左翼组织人士。^①随后，在1968年，巴西独裁政府颁布了“第五机构法”（Ato Institucional Nº 5），废除了最基础的公民权，象征着军事独裁统治最严酷的阶段。

政变以后，巴西政府停止了“独立外交政策”，恢复了与美国的自动联盟关系。该联盟否定南北半球的分化，即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分化。所以两年后，巴西派遣了远征军帮助美国侵略多米尼加共和国并镇压多米尼加的左派运动——可见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多米尼加的左派运动。同时，巴西也同社会主义国家，即古巴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截至六十年代末，巴西与中国在此前发展的政治关系彻底中止，两国的民间关系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巴西人访华再也没有那么容易，而中国直到七十年代也没有再派代表团赴巴西。

中国方面也放弃了之前对巴西的积极外交态度，尤其是从九个中国人被巴西警察逮捕以后。中国对在巴西建立长期商务代表处不再表现出兴趣，提出的原因是巴西不具备外交豁免权，^②并单方面废除了同巴西银行的贸易与支付协定。^③从此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虽然没有断绝但也明显衰落了。与此对照，台湾向巴西派出了以台湾中央银行主席为首的经贸代表团，旨在与巴西及其他八个拉美国家提高贸易交流和政治“友好关系”，因此巴西和台湾关系大大加深了。^④

① Vizentini, Paulo F.,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o Brasil, de Vargas a Lula*; Editora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08, p.42.

② *Viagem do Senhor Horácio Sabino Coimbra à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Horácio Coimbra 先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见：Consulado Gerla do Brasil, Hong Kong, à Secretaria de Estado da União, 1 de novembro de 1971（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1971年11月1日）。

③ 同上。

④ 该代表团访问了巴西和其他八个拉丁美洲欧国家，目的是与拉丁美洲提高经济贸易交流，以及加强两个地区的“友好关系”，所以代表团自称为“友谊团”。可见：巴西驻台北大使馆致电巴西外交部，1964年5月17日《“Missão Econômica e de Boa Vontade” da China Nacionalista que visitará o Brasil de 21 a 31 de maio》。

二、“九人事件”

巴西发生政变时，正在访问巴西的中国代表团和驻里约的新华社记者都被逮捕了，之后在监狱里遭受了一年的残酷待遇。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警察在他们的住所找到了一些药物和针灸，为了诬陷他们，警察说这些东西有毒，是为了暗杀巴西官员而准备的，他们还伪造了一把枪和消音器。^①中国代表团不仅受到巴西警察的严酷对待，还受到了巴西传统媒体的攻击，当时的新闻报刊报道了这样的消息：“来谋杀 Carlos Lacerda（里约市长）的九个中国特务被抓到了”和“毛泽东命令用中国式的暗杀”。^②

新独裁政府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中国代表团，根据 1953 年出台的巴西国防法 1802 号内容，他们最初被判刑 10 年。公诉人 Pinheiro de Barros 使用了该法律的第 2 段和第 25 段，犯罪类型定义分别是“通过国外的支持颠覆《1946 年宪法》规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在国家领土中进行间谍活动”。^③

根据巴西报刊 Correio da Manhã，巴西政府在处理这九位中国人的过程中还受到了台湾的协助。^④台湾派特工加入巴西警察监察队，在监狱里向中国人进行非法询问。来自台湾的特务做了翻译，顺便帮助巴西警察调查中国代表。被逮捕的第二天，巴西警察就威胁这九个中国人，让他们去台湾，警察甚至告诉了他们机票号码，并出示了已准备好的台湾护照。^⑤

在被关押的一年里，九名中国人采取了唯一可行的方式进行反抗，在监狱里进行了两次绝食。巴西方面支持中国的共产组织，如巴西共产党（PCdoB）和人民运动（AP），竭力声援他们。同时中国政府想尽办法投诉巴西警察的行为。根据 O Globo（巴西环球报社）的报道，中国向 69 个国家发过超过两千次的电报，请求支援被巴西警察逮捕的九位中国人。^⑥与中国已经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瑞典的媒体，以批判的角度报道了这起逮捕事件。^⑦巴基斯坦、波兰、古巴、印度尼西亚和瑞士等五个国家的驻巴西大使馆也积极地为九名中国人提供了多种援助。^⑧

①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229.原始资料出自：鞠庆东的报告。

② Jornal o Globo 报刊，1964 年 4 月 4 日，《Diário de Notícias》。

③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133.

④ Correio da Manhã 报刊，1964 年 4 月 9 日，《Formosa envia agente ao Brasil》。

⑤ 鞠庆东的报告。出自：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228, 229.

⑥ O Globo 报刊，1964 年 10 月 28 日，《Pequim mobiliza todos os recursos em sua campanha contra Brasil》。

⑦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180.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965 年 4 月 23 日（65）办 0667 号，《李先念副总理在答谢五国营救九同志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一些国际组织也提供了援助，如国际红十字协会，九位中国人通过红十字会的帮助，将他们在监狱里使用香烟盒和报纸制作的装饰小盒子寄出，一个送给毛泽东、一个送给为他们辩护的巴西著名律师 Sobral Pinto。^①此外，不同国家的律师，来自日本的 Nagano Kunisuke 为首，组成了一个拥护九名中国人的律师小组。^②

最后，1965 年 2 月 26 日，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西政府只能释放这些中国人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这些人回到中国后参与了国家高层工作——如王唯真担任了新华社总社长、王耀庭担任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侯法曾担任了商务部主任、张宝生担任了中国驻莫桑比克和驻安哥拉大使。^③

九名中国人被逮捕的同时，还有一些巴西人也被抓进监狱里待了几天，如巴西主流报社 Última Hora 主任 Etcheverry 和丹尼路·桑托斯律师。前者陪伴过古拉特副总统访华，后来还帮助巴西其他记者赴华；后者给王耀庭带领的贸易代表团担任过棉花贸易会计师。^④当时还有很多与中国保持关系的人都出国避难，如 Henrique Cordeiro Oest 将军，他曾经访问过中国，回到巴西以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拥护中国。^⑤

中国人被逮捕的过程中，公诉人还谴责了巴中文化协会是一个恐怖分子的组织。政变以后，巴中协会的成员被独裁政府迫害而关闭了。同样下场的还有巴西—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和巴西—古巴文化协会。但两年后，巴中文化协会重新启动，以丹尼路·桑托斯律师为首。然而，后来的巴中协会失去了巴西官方政界的配合和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联系，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和贸易机构，而且还是遭到公安部的严厉监控。

九名中国人事件表明巴西新独裁政府对中国没有任何好感，及其对中国推动的民间外交活动所持有的全面压制迫害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中国对外工作重点关注案例之一的九名中国人事件，表明中国虽然与巴西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仍可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巴西政府退步。同时，此次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随后将其对巴外交政策转向纯粹的革命工作。

① 郑志：《九颗红心向祖国——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 年。

② Correio da Manhã 报刊，1965 年 2 月 10 日，《Juristas de todo o mundo com chineses》。

③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180.

④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⑤ Guedes, Cig;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83. 原始资料出自 Heloísa Viggiani 访谈，2014 年 2 月 26 日。

第二节 中国对巴西外交政策的转变

一、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工作重点开始由经济建设转为阶级斗争。^①在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党内。随后，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彻底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议题。

中国国内政策的转向也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此时的中国外交开始逐渐强调输出革命道路，如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报告：“我们应当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②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也变得更为激进。中共开始明确地强调第三世界只能通过人民斗争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干涉，正如毛泽东会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坚决斗争。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③

1965年8月，国防部长林彪对此形势判断进行公开表述，其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该文章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以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斗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表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和支持亚非拉推动革命：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

① 在中国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面临挑战，变得较为孤立，刘少奇和邓小平以更温和的领导方式负责党内的日常工作。虽然如此，中国政治总方针还是受毛泽东及其下属领导的决定性影响。这些方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开始体现，在会议上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大跃进的基本问题，重申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复辟。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24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62年9月27日，第165页。

③ 毛泽东，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年谱—1959.04/1961.06》，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①

随后，中国增加了给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援助，^②而确立了中共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革命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中国官方外交就变成了对外输出革命的工具。中国外交部被极左派控制，打压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部长陈毅。此时除了驻开罗大使以外，其他 48 个派驻国外的中国大使都被召回国，在农村地区参加培训。另外，中国驻国外的大使馆开始发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献。^③

二、中共对巴西共产运动的影响

在中国国内局面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与巴西共产运动加深了联系。从此，中国共产党每年给来自巴西的组织提供在华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还有巴西共运开始更频繁地派领导层人员访问中国。

根据 Rothwell (2013)，中国共产党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举办政治培训课，而在中苏交恶的过程中，中国借此来争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④就巴西而言，共产党曾多次派过学习团参加该项目。从巴共代表团在中国停留的时段和其他端倪来看，可以猜测巴共在 1956 年、1959 年和 1961 年都参加过干部学习课。^⑤但从 1964 年开始，学习课就变成一年一次，并且参加的人比以往更多。

巴西共产党（PCdoB）在 1963 年初次访华的时候，就约定了将派一批干部赴中国参加中共对外联络部的干部学习课。在若昂·阿马鲁的指导下，该组织分别在 1964

① 林彪，1965 年 8 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② 中国将大部分的对外援助给予越南，其在 1959 年重新开启了武装斗争，但中共还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譬如关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中国与苏联不同，前者等到阿尔及利亚解放胜利以后才向法国表示要积极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还在加纳给其他法属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提供了军事培训，其次使用坦桑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给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罗得西亚（现今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和培训。同时，中国政府直接支持了波斯湾的很多马克思列宁组织，从 1965 年开始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可见：“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MLM Revolutionary Study Group in the U.S., Jan., 2007, p. 11, 23-25.

③ 甚至在 1967 年，英国驻华大使馆被一些红卫兵纵火。

④ Rothwell, D. M.,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 23.

⑤ 巴西共产党在 1956 年组织了大规模的赴华代表团。这次的访问目的主要在于以观摩七月份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部分代表团成员在二月份就已到达中国，他们参加了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接抵京。其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中国停留到七月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参见：Peralva, Osvaldo, “O Retrato”, Centro Edelstein de Pesquisas Sociais, 1960, p. 35. 此外，根据 Victor Alba 在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第 5 册第 53-61 页，一共有 13 名巴共党员访问了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在二月份到达，另一部与九月份到达。另外，1961 年有不同巴西代表团访华的消息，其中有一个会见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年谱里就有写“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 年 8 月 19 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0 页。

年4月至9月、^①1965年6月至12月^②和1966年4月至9月，派出了三个学习团访华。^③参加干部学习班的不仅有巴西共产党的成员，还有几名来自于“农民联盟”的盟友干部，^④不过这些人先后加入了 PCdoB。其次，在1966年的学习团里也有参加过“人民运动”的一些领导。^⑤此后，人民运动在1967年和1968年也安排了自己的学习团参加了两次中共的干部学习课。^⑥

1964年至1966年的培训课是其中记载材料最多的。参加此项目的巴西人共有接近40名，第一年有9个人，^⑦第二年有10个人^⑧，而1966年有接近20个人。^⑨因为巴西政治局非常紧张，这些组织秘密飞往中国，从不同道路进入中国领土，在各个国家转机后才到达最终目的地。^⑩从巴西出发的时间也是错开的，以防被警察发现。

干部学习团到中国的第一个城市一般是上海。¹¹以1966年为例，巴西学习团被上海市的中共总书记和上海市市长接待，第二天，学习团才前往北京。学习团每年先在北京学习两个多月的时间，¹²再从北京赴南京继续上两个月的课。在北京期间，他们学习有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在南京期间，与中国解放军负责人学习长期武装斗争和游击战略，以及一些带武装的实践培训，即射击、爬行以及武器制造。¹³

每一年赴中国的巴共学习团，都有记载其他拉美和非洲国家学习团也在，说明中

① “Entrevista à Dyné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20.

② Elio Ramires Garcia 的访谈记录《*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第136页。

③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get/wiNM5_-M/edgard_na_china_1_mp3_wav_0.html。另外可见：笔者2016年2月3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④ 1965年的学习团里有 Tarzan de Castro, Elio Cabral de Souza, Amaro Luís de Carvalho 和 Gerson Alves Perreira。可见：Elio Garcia 访谈记录，《*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第135页。

⑤ 笔者2016年2月3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另外可见：Paulon, A. C., “Entre o Rosário e as Armas: A Ação Popular e a Questã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 (1965-1968)”. Londrina: ANPUH – XXIII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5, p. 5.

⑥ Buonicore, Augusto C., “Capítulos d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2ª Parte)”, Fundação Mauricio Grabois, 12 de setembro de 2014.

⑦ “Entrevista à Dyné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20.

⑧ “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36.

⑨ 笔者2016年2月3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⑩ Folha de São Paulo 报刊, 1968年11月21日, 《China Prepara Brasileiros para Fazerem Guerrilha em Nosso País》。另外可见：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o>。

11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o>。另外可见：“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get/wiNM5_-M/edgard_na_china_1_mp3_wav_0.html。

12 笔者2016年2月3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13 “Entrevista à Mich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300。另外可见：“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36。

共外联提供的政治培训包涵整个第三世界国家。^①资料还表明中共曾专门给巴西和其他葡语国家准备学习课程，虽然阅读材料一般采用西班牙语版，但课程内容都被翻译成了葡萄牙语。^②翻译和接待工作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李北海担任。^③李北海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1960 年毕业以后就从事中巴关系有关工作，1963 年 5 月还访问了一次巴西，会见了里约热内卢州各个工会领导。^④而且根据 1965 年的学习团员 Paulo Marcomini 回忆，他非常扎实地掌握了葡萄牙语。^⑤

干部培训活动非常充实，巴西干部学习团在中国学习期间，除了上课以外还经常看有关课程内容的电影。^⑥在校外，学习团还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如民族音乐演出、舞蹈表演、戏剧和电影展等。^⑦此外，他们大约每周还参观一个地方，如人民公社、农民住宅、工厂乃至监狱。^⑧上课期间，学习团偶尔也外出参观其他城市，如 1966 年的学习团参观了燕南。^⑨周末，学习团也会参观一些旅游景点，如南京的长江和寺庙。^⑩业余时间，中国伙伴还喜欢找他们一起踢足球。¹¹学习团还参加了一些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如 1964 年和 1966 年的五一劳动节大庆典礼，¹²1965 年的十一国庆节晚宴会，当时毛泽东也在场。¹³

因为巴西政治的迫害，学习团返程非常艰难。如 1964 年，有人为了避免巴西警察的检查，在中国多停留了一个月。¹⁴1966 年，一部分人在巴黎转机时，见到了等候

① 根据 Paulo Marcomini 和 Elio Ramires Garcia 在南京同时还有秘鲁和哥伦比亚学习团。根据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巴西学习团会见的恩哥啦和莫桑比克代表团。

② 根据 1966 年的巴共学习团团长 Edgard de Almeida (前后退党参与红翼派)。参见: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get/wiNM5_-M/edgard_na_china_1_mp3_wav_0.html.

③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④ Dirigentes sindicais presentes ao almoço que vários Sindicatos de Petrópolis ofereceram ao Sr. Chao Kuo Chang e Li Bei Hai em Petrópolis no dia 26 / 05 / 1963 (1963 年 5 月 26 日, Petrópolis 市工会领导邀请李北海和 Chao Guoqiang 聚餐)。参见: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 1965.3.5, 34.582 号、第 117 页。

⑤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0>。另外可见: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get/wiNM5_-M/edgard_na_china_1_mp3_wav_0.html.

⑥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0>.

⑦ 同上。

⑧ 同上。另外可见: "Entrevista à Mich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2014 年, 第 301 页。

⑨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mp3/s5tubB6y/edgard_na_china_2_mp3_wav.html.

⑩ 同上。

11 "Entrevista à Mich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301.

12 "Entrevista à Dyné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20。另外可见: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mp3/s5tubB6y/edgard_na_china_2_mp3_wav.html.

13 "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36.

14 Dynéas Aguiar 在中国呆到 10 月底或 11 月初。可见: "Entrevista à Dyné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 2014 年, 第 120 页。

在此的巴共（PCdoB）领导 Elza Monnerat。这位女领导当时在法国流亡，她收到了巴西同志的警告，所以去机场转告巴共学习团不要乘坐原来安排好的航班，否则他们一抵达巴西就会被警察逮捕，所以学习团前往阿尔巴尼亚参观了几个月后才回到巴西；^①另一部分团员飞往秘鲁，一些人经过玻利维亚、另一些人经再过巴拉圭才回到巴西。^②

同样为了安全，学习团离开中国之前就烧毁了所有的笔记材料，避免从中国带回去任何纪念品，但他们回到巴西以后，还是会给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关于在华学习的经验。^③干部学习团在返回的路上都遭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控，在不同国家转机时莫名其妙地被陌生人拍照和质问。^④在 1968 年，Folha de São Paulo（圣保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暴露了巴共（PCdoB）组成学习团赴中国的事情。文章中公布了 18 名团员的名字，刊登了 14 名团员的头像，还仔细地描绘了他们赴中国的路线。文章中提到，部分信息来自于美国中央情报局，^⑤这说明美国与巴西政府联合抵制中国同巴共的活动。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有团员回国后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如 1965 年学习团团员 Tarzan de Castro。^⑥

巴西共产党（PCdoB）的中央委员会希望其干部在中国多学习武装实践技术，^⑦但根据 1965 年学习团团员 Elio Garcia 透露的信息，中共的培训更重视理论内容。在南京时，他们很少进行实践培训，而课程内容仅限于有关中国的革命经验。Garcia 认为 PCdoB 应该请求中共的帮助，来学习更广泛的游击武装战略，如森林游击战略，因为巴西是一个热带雨林国家。^⑧他也提到，在北京进行的学习课程都以毛泽东作品为基础，基本上不参考别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⑨

中共对外联络部提供的干部学习课，似乎更加侧重讲授中苏分裂对巴西共产运动的影响和中共在其中的地位，未必对巴西的实际阶级斗争有巴共所预料的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中共提供的学习课还是帮助了巴共（PCdoB）反对巴西独裁政府和游击队的筹备。从资金方面来看，此项目由中国方面承担了一些费用。前往中国的飞机票由

①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o>.

② “Entrevista à Mich 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 ão e Direito à Resist 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 ç ão Maur ício Graboys, 2014, p. 301.

③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o>. 另外可见：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④ “Entrevista à Mich 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 ão e Direito à Resist 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 ç ão Maur ício Graboys, 2014, p. 300.

⑤ Folha de S ão Paulo 报刊, 1968 年 11 月 21 日, 《China Prepara Brasileiros para Fazerem Guerrilha em Nosso Pa ís》。

⑥ Tarzan de Castro 回国一个月以后就被逮捕了。可见：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⑦ “Entrevista à Mich 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 ão e Direito à Resist 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 ç ão Maur ício Graboys, 2014, p. 300.

⑧ “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 ão e Direito à Resist 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 ç ão Maur ício Graboys, 2014, p. 136.

⑨ 同上。

（PCdoB）安排，但返回巴西的飞机票是由中方提供的。其次，有团员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资助，如 Elio Garcia 一个人收到了两千美元，作为对往来机票和巴西组织工作的补助。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培训对巴共产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的学习团员从课程内容和校外活动当中受到不少启发。虽然学习团与中国领导会谈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布，但此次会谈无疑对巴共产产生了积极影响。每年的学习团由两三个人兼任团长，团长有单独与中共中央领导进行访谈的工作任务，^①如 1964 年与邓小平，^②1965 和 1966 年与周恩来。^③此外，1966 年至 1968 年（最后两年由人民运动组织的）的学习团亲眼看到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 1966 年的资料当中就有学习团见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会干部的记载。^④

这些事情促使巴共不少干部革命情绪高涨，甚至导致了巴共内部的两次分裂。可见巴共党内有一些人主张要更迅速地筹备游击活动，他们自称为“红翼派”，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了中共提供的学习课。1966 年，“红翼派”发布文章抨击党的第六届代表大会发布的纲领。“红翼派”很明显受到中国文革影响，可见它发布的文章评判党领导官僚，并不重视游击武装工作，因此提出“党内的所有的矛盾只能通过内部的积极斗争来解决，该斗争要从下到上，涉及到每一个党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⑤随后，红翼派在 1967 年退出巴西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

除了“红翼派”以外，还有 1966 年 5 月在巴西东北地区有一部分干部也退党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称为“革命共产党”，并吸收了一部分农民联盟的成员和学生会成员。虽然革命共产党尚未与中国直接联系，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但其采取的纲领明显地受到了当前的中国影响，即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共产党退出巴共（PCdoB）时就颁布了一篇文章叫《向大学共产主义者提倡 12 题宪章》。文中提出工人阶级政党需要“推动工人和农民的结盟，为此要促进工人阶级最

① 1965 年的学习团以 Manuel José Nurchis, José Huberto Bronca 和 Ari Olguin da Silva 为团长。1966 年的学习团以 João Carlos Haas 和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为团长。可见：“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35. 另外可见：“Entrevista à Michêi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2014 年, 第 301 页; 另外可见：“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mp3/s5tubB6y/edgard_na_china_2_mp3_wav.html.

② “Entrevista à Dynê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p. 120.

③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mp3/s5tubB6y/edgard_na_china_2_mp3_wav.html.

④ 同上。

⑤ “A sua resolução (dos problemas do partido) só pode se dar através de uma luta interna ativa, que vá de baixo para cima, atingindo todos os escalões do partido, sob a forma de revolução cultural.” 可见：《A luta contra o oportunismo: a origem da luta interna》，1967 年 8 月。

先进的干部、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往农村转流，以建立农村根据地。游击形势的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本身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战略。”^①

尽管巴共中央委员会被“红翼派”批评未曾筹备游击战争，甚至因此发生分裂，但事实上巴共也在这段时间开始筹备武装斗争。在政变后的紧张环境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向党内所有干部公开游击队的实际计划，这让很多人误以为巴共（PCdoB）中央领导对此事没有做任何筹备。但在理论方面，巴共已经明显地公开表示它的政治战略取向。巴西政变以后，PCdoB 批准了一篇名为《从 1964 年政变获得的教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党的领导指出，巴西政治问题无法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②并认为“农民斗争是巴西革命的关键问题”。^③随后，1966 年，第六届全国会议中批准的《团结巴西人》^④，又提出要对农民增加影响力，同时要在巴西腹地开始筹备发起游击武装斗争。

实际上，政变之前巴共（PCdoB）与中国共产党已经安排好了干部培训课程，此时，巴共（PCdoB）已经开始派送干部前往中国，甚至有的党员抵达中国后才得知巴西发生了政变。^⑤该培训项目包含军事培训，似乎可以据此推测巴共早就有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计划，只不过党委员会希望能做出更安全妥善的筹备。所以在 1965 年和 1966 年，巴共（PCdoB）开始派遣来自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的学生和工人干部前往亚马逊地区阿拉瓜亚县，筹备游击队工作，以便争取农民的信任，再一步一步地建立农村根据地。

巴共受到中国的影响非常深刻。中共给该组织提供的干部培训课程，虽然焦点在于国际共产运动的分歧及中共在其中的地位，但也不能否认该项目对阿拉瓜亚游击队

① 同上。

② “Os acontecimentos de março-abril vieram demonstrar o quanto era ilusória a orientação do caminho pacífico”。可见：《O golpe de 1964 e seus ensinamentos》，1964 年 8 月。

③ “A questão camponesa é o problema-chave da revolução”。可见：《O golpe de 1964 e seus ensinamentos》，1964 年 8 月。

④ 《União dos Brasileiros para Livrar o País da Crise, da Ditadura e da Ameaça Neocolonialista》PCdoB, 1966 年 6 月。

⑤ 譬如 1964 年的学习团中，有一部分人在巴西政变前四十天就抵达了上海（可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p. 151），而政变三天之后（4 月 3 日）其他人才陆续抵达。最后当这九个人在北京集合时，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你们看，今天我们接待九个巴西人来多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九个同志被巴西反动派逮捕。”（可见：Guedes, Cícero;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68. 原始资料出自：Depoimento de Dyneas Aguiar cedido aos autores pelo historiador Augusto Buonicore, secretário geral da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Dyneas Aguiar 的报告，Maurício Grabois 基金会主席提供的)。

的付诸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4 年至 1966 年，在中国参加干部学习课的 40 人中，有 14 名（三分之一的人）学业结束后加入了阿拉瓜亚游击队。^①

除了参加干部学习课程的巴共（PCdoB）之外，还有一系来自巴西的左翼组织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中国的影响，即便是通过间接的渠道或是主观的启发。文革爆发时，恰好在巴西也出现了一系列反独裁政府的武装斗争运动。根据巴西空军安全信息中心的档案，1966 年到 1974 年，巴西一共有 47 个左翼组织，其中 15 个举行了游击武装斗争。^②

三、巴西的毛泽东思想组织

随着中苏交恶，世界一系列国家开始成立亲中共的独立组织，一般称为马克思列宁共产党。^③就拉丁美洲而言，在 1964 年成立了秘鲁的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随后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也都相继成立了相关党派。在 60 年代的巴西，巴共（PCdoB）和“人民运动”这两个组织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主张借鉴中国革命模式和毛泽东思想。

巴西共产党（PCdoB）则在六十年代频繁访华。除了送学习团赴中学习以外，巴共也派遣领导单独与中共领导会谈，如 1963 年 3 月若昂·阿马鲁和 Lincoln Oest 访华，1967 年若昂·阿马鲁访华，^④1971 年 9 月佩德罗·波马尔访华。^⑤

巴共（PCdoB）成立不久后，就公开主张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参考。巴共的著名领导毛里西奥·盖伯斯更是如此，早在 1963 年 7 月便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毛泽东是国际共产运动里最重要的尚在世的理论家，将毛泽东放在马克思、安

① 他们是：André Graboys, codinome Zé Carlos na Guerrilha do Araguaia; Ângelo Arroyo, codinome Joaquim; Arildo Valadão, Ari; Daniel Ribeiro Callado, Daniel; Divino Ferreira de Souza, Nunes; Elza de Lima Monerat, Tia Maria; Lbero Giancarlo Castiglia, Joca; João Carlos Haas Sobrinho, Juca; José Huberto Bronca, Fogoió; Manoel José Nurchis, Gil; Miche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Miguel Pereira dos Santos, Cazuza; José Lima Piauhy Dourado, Zé Ivo; Osvaldo Orlando Costa, Osvaldão（可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 152）。其中有三入 Osvaldo Orlando da Costa（Osvaldão）、Daniel Callado 和 Paulo Mendes Rodrigues 战死（可见：Guedes, Ciga;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68,69）。

② 其中最著名的是 1966 年至 1967 年的 Caparaó 山游击队，以南大河州前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主席为首；1968 年爆发的城市游击战，以退出共产党的马里格赫拉领导为首；1969 年在圣保罗州的 Ribeira 谷游击斗争，以军事队长 Carlos Lamarca 成立的人民革命先锋（VPR）为首；此外还有巴西共产党（PCdoB）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筹备阿拉瓜亚游击队的基础工作。可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 147. 原始资料出自：秘密文件，1972 年 8 月 11 日，第 1、2 页《空军安全信息中心主任，准将 Newton Vassallo da Silva 先生，在空军部长办公室，报道空军最高司令部》。

③ Rothwell, D. M.,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p. 23.

④ Buonicore, Augusto C., “Tributo a João Amazonas (1912-2002) - Um Comunista Brasileiro”, Portal Vermelho, <http://www.vermelho.org.br/noticia/172223-1>, 1 de janeiro de.

⑤ Bertolino, Osvaldo, *Pedro Pomar: Ideias e Batalhas*,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3, p. 87.

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同样高的地位。盖伯斯的文章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世界革命的先锋支队。^①

但巴共(PCdoB)明确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此时，巴共开始在党的报刊“A Classe Operária”(工人阶级)，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如佩德罗·波马尔在1968年2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和国际重要性，这就是我们当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巴西共产主义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向人民展现出解放人民的革命道路”；^②同样，巴共出版社也出版了中共领导的主要文章，如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随后，巴共(PCdoB)就开始自称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党”，认为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现今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人民运动”组织则从1966年就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除1966年开始向中国派遣学习团外，“人民运动”组织还在哈瓦那的三洲会议中会见了中国代表。当时人民运动委员会主席Aldo Arantes受中方邀请，于当年前往中国访问。Arantes访华以后颁布了一本黄皮书(Livro Amarelo)^③，探讨的主题是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人民武装斗争、先锋党和统一战线组织。^④此文章增进了人民运动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了该组织进一步联合中国共产党。

直到1966年为止，“人民运动”组织同时支持古巴和中国，并与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保持联系。但在1966年，“人民运动”按照古巴革命武装战略在累西腓市机场执行了一次袭击活动，目标是军事部长(后任国家总统)科斯塔·伊·席尔瓦上将。这场袭击以伯南布哥州政府部长和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牺牲告终，另有15人受伤。袭击之后，“人民运动”遭受了独裁政府的极大镇压，而这件事情使得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进一步探讨了武装斗争的其他战略。随后，“人民运动”领导进行了自我批判，开始倾向于借鉴中国革命经验的人民长期武装斗争战略。

随着古巴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淡化，“人民运动”与古巴共产党彻底断绝了关系，而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参考。^⑤“人民运动”确立的第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路

① 这位领导是阿拉瓜亚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在1973年12月25日战死。可见：Buonicore, Augusto, Meu Verbo é Lutar – A Vida e o Pensamento de João Amazonas,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174.

② “A revolução cultural proletária veio demonstrar a importância histórico-mundial do pensamento de Mao Tse-Tung, como o marxismo-leninismo do nosso tempo (...) Os comunistas brasileiros (...) erguem, cada vez mais alto, a bandeira vermelha do pensamento Mao Tse-Tung, que descortina para o povo o caminho da revolução e da guerra revolucionária de libertação”.可见：A Classe Operária 报刊，1968年2月，10日。

③ 这个名称是因为书的封面是黄色。可见：Paulon, A. C., “Entre o Rosário e as Armas: A Ação Popular e a Questã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 (1965-1968)”. Londrina: ANPUH – XXIII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5, p. 7.

④ Buonicore, Augusto C., “Capítulos d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2ª Parte)”,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12 de setembro de 2014.

⑤ 这两个组织一开始尽量与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保持盟友，尤其是与古巴共产党，但随着古巴靠近苏联共产党和中共交恶，这些组织与亲古巴组织开始有分歧。亲中国的组织认为卡斯特罗路线的根本错误在于：(1)“根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的、浪漫的、个人主义的、极左的；(2)依靠的是非无产阶级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而不是群众；(3)否定人民民主革命的阶段革命理论，号召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即实行；(4)不尊重一党制领导革命；(5)摒弃党指挥枪、政治重于军事行动的思想。可见：[美]维尔纳·贝尔(Werner Baer):《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线的方案是在 1969 年 6 月，即中央委员会批准的 Jair Ferreira de Sá 领导的文章。该文章是这位领导在 1967 年下半年访华回来之后写的，^①其中提出（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今阶段；（2）巴西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巴西革命有民族民主性质；（4）长期武装斗争是巴西革命的主要战略；（5）人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6）加入生产行业作为人民运动干部的思想改造方式。^②文章中还定义古巴与苏联一样属于修正主义，而“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核心力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③

随着“人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改善，该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及其他一些具体的斗争中开始靠近巴西共产党（PCdoB）。1969 年 5 月，“人民运动”和巴共（PCdoB）共同开会探讨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起来。^④在此背景下，“人民运动”的一部分领导提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并且主张贯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经验。于是，两年以后人民运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分裂，一部分领导和干部退出了该组织，建立了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运动（马列人民运动）的新组织。该组织又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小组，其中一个主张加入巴共（PCdoB）。最终，在 1972 年 9 月，该小组就加入了巴共。

① Zachariadhes, Grimaldo C., “Ditadura militar na Bahia: Novos Olhares, Novos Objetos, Novos Horizontes”, Salvador: 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 2009, p.161.

② Notícias de Jornal Velho: a Ação Popular (AP) - Final; 2005 年 6 月 8 日; Carlos I. S. Azambuja; 另外: Buonicore, Augusto C., “Capítulos d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2ª Parte)”, Fundação Mauricio Grabois, 12 de setembro de 2014.

③ 同上。

④ Azevedo, Carlos. 2011. *Jornal Movimento: Uma Reportagem*. Belo Horizonte: Editora Manifesto, p. 124.

第五章 中巴建交与政党关系的结束（1969-1974）

第一节 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巴建交

一、中巴关系的改善

在 60 年代末，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国内政治来讲，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初期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外交部不再受民众运动的掌控，从而主动权重新回到中共中央原来领导的手中。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外交部消除了极左政治行动，开始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并让邓小平及其他受到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领导恢复职位。

从国际情势来讲，中国虽然在六十年代下半页争取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外交支持，但尚不能够脱离国际孤立的处境，并且失去了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外交支持，如印度尼西亚、布隆迪，突尼斯，加纳和达荷美（今贝宁）。所以到了 1969 年，世界上只有 50 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同时中国还面临亚洲复杂的地缘局面：在靠近中国南方的位置，美国在越南作战；东边，日本的国力在增长；而北方，苏联又在边境派遣军队。这些都威胁着中国的军事力量，使中国感受到四面楚歌的压力。因此，中国开始同美国关系破冰，并与苏联保持敌对关系。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力量有所减弱，预示着战败的到来。美国开始改变自己的对外战略以便恢复其国际优势地位。美国相信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可以在短期内迫使苏联撤军和停战，而在长期内孤立苏联。在 1971 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而一年后尼克松在北京会见毛泽东，象征着两国关系转好。这也推动了中国替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同时中国和苏联关系逐渐恶化，到 1969 年，两国在珍宝岛和乌苏里江爆发了武装小冲突。中苏关系从最早的一边倒政策转变为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国一样压迫全世界人民，正如 1974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世界各国分为三个层次：（1）亚非拉国家作为第一个中间地带；（2）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作为第二个中间地带；（3）上述所有被压迫国家作为美苏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对象。^①

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型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也给中拉关系带来了改善的机会。因

① 因为中共视苏联和美国为同一帝国主义地位，所以中国也开始冲击苏联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说拉丁美洲人民一边遭受美国的经济掠夺，一边遭受苏联的政治干涉。正如中国英文报刊 *Peking Review* 几年后的报告，“苏联使用各种手段，武力也好武装也好，在拉丁美洲国家扩张霸权地位，”譬如企图渗透巴西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军队，和企图在这些国家的民众组织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见：*Peking Review* 报刊，1976 年 2 月 20 日，第 8 号，《New Tsars Intensify Expansion and Penetration in Latin America》。

此在七十年代，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政府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如 1971 年秘鲁，1972 年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牙买加，以及 1974 年的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巴西也开始考虑往这个方向发展。

二、中巴建交

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巴对彼此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两国重新对经济贸易交流表示出兴趣，中巴贸易又开始逐渐增长。从而在 1971 年巴西商务部部长访问伦敦时，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当年，古巴甘蔗欠收，中国所需求的甘蔗只得从其他国家购买，所以贸易代表团承诺要大规模进口来自巴西的蔗糖。这一事件代表两国之间打开了第一条官方渠道。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1973 年，中国一直处于巴西蔗糖进口国排名前列。^①巴西商务部长主张两国不要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关闭贸易，他在签署合同之后就讲到了“贸易没有政党”。^②

同时，中国遇到了改善两国政治的机会，开始对巴西政府持更为积极的态度。1971 年 10 月，巴西速溶咖啡企业家 Horácio Coimbra 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赴华参加深圳展览会。当时驻香港总领事 Geraldo Cavalcanti 受巴西政府指示，作为特别嘉宾陪同这名巴西企业家。虽然巴西总领事并不愿意表示这次访问是一次正式的官方访问，但此事极具标志性。后来他说了中国接待人与官方访问似的对他一样优惠，表明中国很看好他来访。^③

从中国与巴西改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巴西把经济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这件事反映出一些巴西经济阶层对于开拓中国市场的愿望，特别是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严重影响到巴西外贸。当时巴西政府过度依赖石油进口和资本产品进口，危机爆发后，巴西收到的外国投资大大减少，而且国内的出口产品也开始滞销。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驻香港总领事访华时得出了以下结论：“由于西方长期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贸易变化”，经济不断增长的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巴西与中国发展贸易能够带来很多商机，“替代一部分发达国家市场”。^④总领事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延迟与北京进行直接贸易会给巴西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等巴西决定联系北京时已经很难获得机会，因为中国需要的商品已由巴西的竞争对手

① 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115; 原始文献: Divisão de Transportes e Comunicações, de 30 de julho de 1974 (巴西外交部运输与通信部门, 1974 年 7 月 30 日)。

② [巴西] 雅尼丝·伊利克:《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陈笃庆访谈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96 页。

③ Consulado Gerla do Brasil, Hong Kong, à Secretaria de Estado da União, 1 de novembro de 1971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 1971 年 11 月 1 日), *Viagem do Senhor Horácio Sabino Coimbra à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Horácio Coimbra 先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④ 同上。

供给，而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与中国开始有联系。二是，使中国对巴西怀有负面印象，并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朝负面方向发展。^①

从此，巴西外交部不少人认为巴西应该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如外交官兼任军事高等学校^②参谋 Carlos Antonio Bueno 在军事俱乐部刊物发表了一篇报告，主张巴西经济只能争取中国市场才能延续过去的局面。^③

在香港总领事提醒及外交部劝告下，1972 年 5 月，巴西国家安全立法会秘书处放松了对于中国贸易的控制，并建议国家“采取谨慎和包容的态度在恰当时机采取适当措施”。^④随后中巴贸易持续增长，两国开始互派贸易代表团也重新实现。^⑤

同时，中国利用巴西希望开展中巴贸易之事来进一步谋求巴西的外交承认。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会见了巴西驻希腊大使，当时两人正在莫斯科参加希腊国庆节，中国大使向巴西大使表达了对新总统上任的祝贺，^⑥并称中国与巴西“已经有很充实的贸易关系”^⑦，但因为“两国同样尽量发展起来”，^⑧所以只进行贸易关系还不足够。此后中国大使说，中国已经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伙伴，欢迎巴西成为新的伙伴。^⑨

1974 年，埃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出任巴西总统，甫一上台就表示愿意与中国加深关系。其上任两周以后，巴西外交部即请求中国与巴西代表团商讨两国建交事宜。为此巴西商业协会主席 Giullite Coutinho 带领外交部处长在内的 24 人代表团访华，并传递了将专门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巴西的信息。^⑩在双方的积极互动下，1974 年 8

① 同上。

② 军事高等学校是独裁政府的最重要研究机构。

③ Bueno, Carlos Antonio. B., “O Brasil e o Extremo Oriente”, Conferência pronunciada na 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 Biblioteca da 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 6 de julho de 1973.

④ 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11, 原始资料出自: Exposição de Motivos nº 29, da Secretaria de Segurança Nacional, de 10 de maio de 1972 (巴西国安局展示动机, 29 号, 1972 年 5 月 19 日)。

⑤ 比如 1972 年，巴西商业协会主席 Giullite Coutinho 带领的八人代表团访华。参见：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⑥ “Melhores votos de felicidade e prosperidade”。可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0。原始资料出自：巴西驻苏联大使馆电报, 132 号, 1974 年 3 月 27 日。

⑦ “Já existirem excelentes relações comerciais”。参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0。原始资料：巴西驻苏联大使馆电报, 132 号, 1974 年 3 月 27 日。

⑧ “Dois países empenhados em uma luta titânica pelo desenvolvimento”。可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0。原始资料出自：巴西驻苏联大使馆电报, 132 号, 1974 年 3 月 27 日。

⑨ “A China já tem nas Nações Unidas muitos amigos e esperava poder contar com o Brasil entre eles”。可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0。原始资料出自：巴西驻苏联大使馆电报, 132 号, 1974 年 3 月 27 日。

⑩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丹尼路·桑托斯的访谈记录。

月3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代表团前往巴西，他们会见了巴西总统盖泽尔。在这次访问中，两国最终达成了正式外交协议。^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巴关系改善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利益需求，但经济利益自身还不足以促使两国建交。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讲，70年代中巴贸易有所增长，其次两国都有很强的潜在增长力量，但贸易总量还微不足道，直到1978年1月中国和巴西签署贸易条约以后，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才开始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对照，在中巴建交的前一年，台湾和巴西贸易总额达到八千万美元，巴方享有绝对顺差，相当于中巴贸易总额的七倍。^②

经济贸易利益只能解释一部分中巴建交的原因，而政治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特别担忧颠覆活动带来的风险，所以尽量回避国际政局给国内社会带来的影响，害怕反政府力量增加。那时巴西有两个政治机构由军队控制，相当于部长和司法机关，一个叫国家公安委员会，另一个叫军事参谋会。这两个机构的绝大多数成员带有很浓厚的保守意识形态，反对中巴建交。但是通过巴西外交部和总政机构的劝说，他们一致妥协而改票为支持建交。^③

巴西外交部从1969年起更多地关注中国。当时巴西驻香港领馆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巴西外交部相信中巴建交不会威胁到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可见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在1971年批准的一篇报告，名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发展—1970年》，曾专门讨论中巴关系。^④该文章分析了新华社在1970年登刊的所有关于巴西的消息，大部分消息是在评论亲苏联的巴西共产党所颁布的文章和报告，其次多的消息是用一些事件来“试图在巴西发起反美觉悟，而间接地批评美国对巴西的政策”，^⑤少数消息是有关巴西的社会问题，其中只有三个消息直接批评了巴西独裁政府。^⑥总领事馆的文章提出的结论是，中国对巴西侧重两个方面的事务：（1）与巴西政府联合，以争取其外交支持；（2）一边设法削弱巴西与美国联

① 1974年8月3日15日，中巴建交。参见：[巴西]雅尼丝·伊利克：《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陈笃庆访谈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8、99页。

② 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5; 原始资料出自：Divisão de Transportes e Comunicações, de 30 de julho de 1974（巴西外交部运输与通信部门，1974年7月30日）。

③ Guedes, Cígar;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p. 193. 另外可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26, 127。原始资料出自：外交部，本号：9 E2.1, 1974年5月8日。

④ 巴西驻香港领馆致电外交部，1970年，《Relatório sobre o Desenvolviment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da China (RPC) durante o ano de 1970》。

⑤ “Criticar indiretamente posturas específicas dos EUA, tratando de acontecimentos que inspiravam o antiamericanismo no Brasil”。可见：Amado, Andr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át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p. 102。原始资料出自：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电报6167号，1966年6月10日。

⑥ 同上。

系，一边设法削弱苏联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①

所以巴西外交部相信中巴建交不会影响到巴西国内的社会斗争，并不威胁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可见，巴西驻香港总领事 Miguel Osório de Almeida，在 1969 年批准的一篇 400 多页的报告中探讨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报告指出，“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很激进，但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鼓励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②其次，报告认为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内斗已经结束，此事“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各地扩张联系的道路，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③另外，盖泽尔总统上台后不到一个月，巴西外交部部长 Azeredo da Silveira 向他致信，阐述外交部为什么认为巴西应该同中国建交。信里提出的 15 个原因其中有以下两个：

(1) “直到最近，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论点不仅在于政治思想方面，还在于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因此巴西不接受中国外交代表。关于此事，我恳请您考虑，中国在 1969 年以后难以恢复曾经进行的颠覆活动，那些活动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如果今天重新进行，中国政府将很难再控制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④

(2) “直到 1969 年，国际事务使得中国同西方国家保持对立立场，并在政治、经济和贸易上被孤立。但中国重新评估了自己国家的利益，继而开启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一面。基于这种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了其新兴大国的地位，并在与西方国家的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精明的政治技巧和灵敏的外交作风。”^⑤

① 同上。

② “Não obstante o radicalismo ideológico do período da Revolução Cultural (...) o governo chinês não mais visava a incentivar os movimentos revolucionários ao redor do mundo. 可见：Pinheiro, Letícia, “Restabeleci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com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 Uma Análise do Processo de Tomada de Decisão”, Rio de Janeiro: Estudos Históricos, Vol. 6, No. 12, 1993, p. 252.

③ “Tendo-se encerrado a disputa interna entre as lideranças chinesas, abre-se caminho para a implementação de um projeto de alargamento das relações da RPC com o resto do mundo, independente das posições ideológicas dos países”. 可见：Pinheiro, Letícia, “Restabeleci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com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 Uma Análise do Processo de Tomada de Decisão”, Rio de Janeiro: Estudos Históricos, Vol. 6, No. 12, 1993, p. 252.

④ “Até recentemente, o principal argumento contra o estabeleci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com a RPC se inspirava não só em considerações de fundo ideológico, como também em razões de segurança nacional que contra-indicavam a presença, no Brasil, de representantes diplomáticos chineses. A respeito, peço-vênha para ponderar que a praxe chinesa certamente desaconselharia, depois de 1969, o reinício de atividades subversivas que, no passado, lhe acarretaram prejuízos tão desastrosos e que, se repetidas hoje, dificilmente obedeceriam ao controle político e ideológico de Pequim.” 可见：巴西外交部档案馆，1974 年 4 月 9 日；G/110/920 (B46) (E33)，Antonio F. Azeredo da Silveira 《Exposição de Motivos》。

⑤ “Se as convergências da vida internacional colocaram, até 1969, a RPC em posição refratária ao convívio com as demais nações, por força do isolamento político, econômico e comercial a que foi relegada, a reavaliação dos seus interesses nacionais marcou o início de uma nova era na sua política exterior. Como consequência dessa reviravolta, a RPC consolidou sua posição de potência emergente e vem dando mostras de argúcia diplomática e sensibilidade política no trato com outros Estados em todos os foros da vida internacional.” 可见：巴西外交部档案馆，1974 年 4 月 9 日；G/110/920 (B46) (E33)，Antonio F. Azeredo da Silveira 《Exposição de Motivos》。

第二节 中共与阿拉瓜亚游击队

一、巴西共产党与阿拉瓜亚游击队

中巴两国的官方关系正在改善，同时巴西共产党（PCdoB）在阿拉瓜亚地区推动的游击战争正开始付诸实施。1969 年，巴西共产党宣布全面实行游击武装斗争路线，当年 1 月，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一篇文章——《人民战争 - 巴西武装斗争的道路》，提出游击战争是巴西人民斗争的唯一出路。该文章用了林彪的引文分析武装斗争，并称“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杰出贡献，党必须要学习武装斗争的大纲及其发展的条件。”^①

当时巴西正经历一场大型抗议浪潮：1968 年 6 月 26 日，尽管面临遭受独裁政府迫害的危险，十万名示威者仍然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游行。当年还爆发了一场城市游击战，以退出传统巴西共产党的马里格赫拉领导为首；1969 年，在圣保罗州又爆发了 Ribeira 谷游击斗争，以前军事队长 Carlos Lamarca 成立的人民革命先锋（VPR）为首。与此同时，巴西共产党（PCdoB）正在竭力筹备阿拉瓜亚武装斗争的基础工作，一边争取农民的支持，一边组织游击队。

阿拉瓜亚游击战争在 1972 年全面爆发，并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 1973 年底。游击战争爆发以后，国家军队从 4 月份开始围剿该地区。但因为游击队逃往森林地区，所以军队失败。此后军队开始使用间谍和特务工作逐渐进入阿拉瓜亚，并举行了两次军事袭击。从此巴共率领的游击队不断经历挫折：军政府不仅消灭了游击队，而且在城市里进行疯狂的逮捕、酷刑及暗杀，党损失了大部分领导人和干部。^②

阿拉瓜亚战败给巴共（PCdoB）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巴共开始走向衰落，而在组织虚弱的状态下，直到 1976 年，全国中央委员会领导基本上无法集合开会。1976 年，巴西政府给予该组织致命一击：在巴共内部间谍协助下，巴西警察发现了中央委员会准备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并发动突袭（被历史学界称为“Lapa 宰杀”）。此次袭击行动杀害了佩德罗·波马尔和 Ângelo Arroyo 两位领导，逮捕了其他五位领导（Elza Monnerat、Haroldo Lima、Aldo Arantes、Joaquim Celso de Lima 和 Maria Trinidad）。^③

① “Baseado no marxismo-leninismo, nas geniais contribuições de Mao Tse-tung sobre a guerra popular, o Partido deve examinar as premissas para o surgimento e desenvolvimento da luta armada e delinear, num plano mais geral, o curso provável desta luta.” 《Guerra Popular - Caminh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1969 年 1 月。

②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p. 54,55.

③ Lapa 宰杀发生的时候，一位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若昂·阿马鲁正在访华，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幸未被残害。可见：Buonicore, Augusto C., “Tributo a João Amazonas (1912-2002) - Um Comunista Brasileiro”, Portal Vermelho, <http://www.vermelho.org.br/noticia/172223-1>, 1 de janeiro de 2012.

二、中共与巴共的矛盾及双方关系的结束

中国致力争取巴西独裁政府的外交支持，影响到其对巴西政府的态度。在两国改善关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避免同巴西政府发生公开的政治摩擦，并且在一些国际问题分歧中试图与巴西政府结成同盟。

当时中国同巴西独裁政府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中国主张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反对超级大国核威胁与核讹诈。而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美国家都与中国立场相同，所以它们缔结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并于1968年4月22日开始生效。^①此外中国希望能扩大领海宽度，与美国相抗衡，^②而巴西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早就提出过此要求。^③所以中国在70年代，就开始表示支持这些国家，并要求保卫领海权。^④关于此事，人民日报的报道反映出中国对巴西政府的缓和态度，提出巴西政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盟友：“中巴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⑤

然而，中国对巴西的新外交态度给中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1972年巴共领导访华与中共谈判，在巴共与耿飚对话的纪录中就能看出巴共对此表示不满：巴共希望中国提出“在维护二百理海洋权的斗争中，不与巴西政府联盟”，反而要“暴露巴西军事法西斯独裁政府的卖国态度”；巴共认为巴西政府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提出维护海洋权，只不过是把人民的关注点从批评政府转移到（假的）爱国主义。^⑥

根据Carlos Studart的作品中有关1976年“Lapa 宰杀”的相关记载，^⑦可以观察到巴西共产党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外交政策做出了全面批判，批判中共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新解释，以及中国承认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等一些拉美国家独裁政府等做法，认为“中国放弃了之前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⑧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一样受

① 人民日报，1972年11月14日。另外可见：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1页。

② 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0页。

③ 如在一九四七年，智利和秘鲁宣布其领海范围为二百海里，后来一系列的拉美国家，包括巴西，都为此而斗争。

④ 人民日报，1970年11月20日；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2159_611322/t8983.shtml。

⑤ 人民日报，1974年8月17日，《祝贺我国同巴西关系的新发展》。

⑥ “Defesa firme e serena de nossa posição, desmascarando com fatos concretos o caráter entreguista da ditadura militar-facista.”可见：“Relatório do CC/PCdoB sobre contatos mantidos na Albânia e China (1972-1973?)”（《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巴共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Os Arquivos Secretos da Guerrilha do Araguaia – 10 Documentos d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São Paulo: Cópia de documento apreendido no aparelho do PCdoB.

⑦ 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⑧ “Em 1972, quando Chu En-Lai convidou o presidente dos Estados Unidos, Richard Nixon, para visitar a China, os líderes do PC do B ficaram chocados e registraram que a China estava renegando suas posições anteriores de combate ao imperialismo ianque”。参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p. 162.原始资料出自：“Lapa 宰杀文件”。

到了巴共的批评，可见以下评论：

“中巴恢复外交关系是一项严重错误的决定，不符合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与被希特勒控制的德国达成了协议，是因为有助于苏联的战争战略，阿尔巴尼亚与希腊建立关系是为了解决边境冲突，但中国同巴西没有这么合理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不应该去掉阶级斗争的界限。为什么中国不承认南朝鲜、柬埔寨、南越南，而承认巴西独裁政府？我们无法理解中国怎么可以同智利和巴西建交。中国看第三世界国家不会区分谁民主、谁独裁、谁有什么制度。中国成了盖泽尔的盟友，但不懂巴西独裁政府想建交并不是因为其先进，而是因为美国老大的命令。”^①

然而在巴西共产党对中国做出批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疏远了巴共。尽管在两国共产党的内部讨论中，中国表达了对阿拉瓜亚游击队的支持，但中共实际上减少了对巴共的援助和支持。巴共认为在游击斗争的决定性时刻，中国没有给予资金、武器、甚至公开声援。^②

1971年9月，巴共领导佩德罗·波马尔访问中国，并会见了周恩来。根据《佩德罗·波马尔传记》，周恩来虽然对阿拉瓜亚游击队表示支持，但情绪并不乐观，他向波马尔讲述了60年代亚非一系列国家的游击队经验，^③并提醒波马尔它们最后都战败了。周恩来还提出世界革命浪潮是否在缓降的问题。^④所以中国共产党可能也不相信巴西共产党（PcdoB）有足够力量推翻独裁政府。

① “O reatamento de relações China-Brasil é uma atitude concreta e incorreta. Não se pode dizer que está no quadro da coexistência pacífica. As relações da União Soviética com a Alemanha de Hitler tinham o objetivo de abrir caminho. As da Albânia com a Grécia são para tratar de problemas de fronteiras. Mas a China não tem nada disso com o Brasil. Não se deve apagar as fronteiras da luta de classes na questão da relação entre países. Por que a China não reconhece a Coréia do Sul, o Camboja, o Vietnã do Sul, e reconhece a ditadura brasileira? Como entender isso? Não se compreende como a China pode continuar a manter relações com o Chile e com o Brasil. No Terceiro Mundo, a China colocou tudo num saco: ditadura, governos democráticos, etc. A China passa a ser aliada de Geisel e não compreende que a ditadura só estabeleceu relações, não porque seja progressista, mas porque os patrões americanos mandaram.”参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 166。原始资料出自：PCdoB 中央委员会，《Sobre as Relações》，神保罗市，1975年（“Lapa 宰杀文件”）。

② “O Partido Comunista da China jamais empenhou apoio efetivo ao PC do B. Nem mesmo emprestou qualquer tipo de apoio em seu momento mais decisivo, durante a Guerrilha do Araguaia. Nem armas, muito menos dinheiro. Nem mesmo um mero apoio moral”. 参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 159,160。

③ “O mesmo ocorrera na Birmânia, na Malásia, na Indonésia e também em diversos países africanos. Quando as massas não estão dispostas a empreender a luta armada, não basta que o partido esteja. Zhu Enlai falava pausadamente, discorrendo sobre as diversas experiências recentes de lutas armadas e a constância maior de derrotas.”参见：Pomar, Wladimir, *Pedro Pomar – Uma Vida em Vermelho*,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13, p. 38。

④ “Levantou a suposição de que o movimento revolucionário internacional poderia estar ingressando num longo período de descenso, após os movimentos de descolonização que, como uma grande maré crescente, haviam se espalhado após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参见：Pomar, Wladimir, *Pedro Pomar – Uma Vida em Vermelho*,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13, p.38。

但值得思考的是，中共是否清楚巴共推动的游击斗争的实际规模和影响力？根据已有资料，巴共在 1972 年访问中国时，向中共极其细致地讲述了阿拉瓜亚游击队的主要状况，但那是游击武装斗争爆发的初步阶段，斗争局面比较有利。而 1972 年访问时，在两国共产党对话纪录中没有任何消极的消息关于阿拉瓜亚游击队。巴共领导人与江青的对话中，江青认为“巴西同志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她相信巴共领导在斗争中的指挥作用，也相信该斗争会成功”，^①江青还传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贺词，说“他们得知阿拉瓜亚游击战争爆发后感到很高兴，爆发的时间比他们预料的还要早”。^②随后 Peking Review 和其他报刊都有报道该游击战争的发展。

也许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巴西存在不一样的看法，中国媒体的报告有可能只是宣传性的报告，并不代表中共的实际估量。无论如何，在 1973 年中国媒体基本上没有做关于阿拉瓜亚游击战争的新闻报道，此时中共与巴共也没有继续会见。中共应该不清楚阿拉瓜亚游击斗争在 1974 年已经失败。

中国没有等到阿拉瓜亚游击队结束才表示愿意与巴西建交。在阿拉瓜亚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由于优先考虑国家外交利益而决定了与巴西政府建立同盟，尽管这可能会削弱巴西共产党进行颠覆运动的能力。

巴西共产党虽然在对外媒体上仍然支持中国，并在 1975 年 1 月致信中国共产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后亦祝贺中国国庆。^③但在党内已经不赞成中共。1975 年，巴共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对外关系》^④一文中指出：

“自从 1971 年，中国改变了，不再提出对世界武装斗争的支持（…）中国疏远了人民。帮助我们的是那些发出反对巴西独裁政府声音的国家，而不是与独裁政府建立关系的国家。在广播里，中国再也不批判巴西的独裁政府及其诡计。中巴关系的建立，是基于中国恭维独裁政府的新态度的。”^⑤

① “[Chiang Ting] reafirmou a confiança que tem no êxito de nossa luta, na justeza de nossa linha, na capacidade da direção do nosso partido”。可见：“Relatório do CC/PCdoB sobre contatos mantidos na Albânia e China (1972-1973?)”（《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巴共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Os Arquivos Secretos da Guerrilha do Araguaia – 10 Documentos d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São Paulo: Cópia de documento apreendido no aparelho do PCdoB.

② “[Chiang Ting] Em nome externou a satisfação pelas grandes vitórias do Partido em apenas dez anos [de existência] e a alegria pelo início da luta armada num prazo mais curto do que esperavam”。可见：“Relatório do CC/PCdoB sobre contatos mantidos na Albânia e China (1972-1973?)”（《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巴共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Os Arquivos Secretos da Guerrilha do Araguaia – 10 Documentos d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São Paulo: Cópia de documento apreendido no aparelho do PCdoB.

③ A Classe Operária 报刊，93 号，1975 年 1 月，《Mensagem ao PC da China》；另外可见：A Classe Operária 报刊，101 号，1975 年 10 月，《Viva a China Popular》。

④ “Sobre as Relações”。可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166. 原始资料出自：PCdoB 中央委员会，圣保罗市，1975 年。来源：《Lapa 宰杀》。

⑤ “A partir de 1971, a China mudou: não mais se fala em apoio à luta armada. (...) A China se isola do povo. Quem nos ajudam são os que levantam a voz contra a ditadura, e não os que estabelecem relações com ela. Na Rádio, a China não

中国共产党与巴共还有了一次接触。那是 1976 年 12 月，巴共派送若昂·阿马鲁领导访问了中国，在那里向中共领导阐述了巴共的不同意见。但没有解决矛盾。^①此后，巴共开始称呼中国为修正主义，断绝了与中共的关系而只承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作为“世界革命先锋党”。

tem espaço para denunciar a ditadura e suas tropelias. As relações foram estabelecidas à base de elogio à ditadura”。参见：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p. 166. 原始资料出自：PCdoB 中央委员会，《Sobre as Relações》，神保罗市，1975 年。来源：“Lapa 宰杀文件”。

① Oliveira, Pedro de, “João Amazonas”, Biblioteca Digital da Câmara dos Deputados, Centro de Documentação e Informação, p.93.

结论

在中巴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中国外交的复杂多重面相，以下将从1) 无产阶级国际革命利益；2) 国家外交利益；3) 国际革命和国家外交双重利益等三个角度进行概述。

1)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阶段和文化大革命的最激烈的阶段，中国同巴西的外交政策带有强烈的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外交政策倾向于革命输出，优先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中巴两国的官方关系。

就第一个阶段来讲，新中国尽管从一开始就公开欢迎与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负有高度责任。而巴共受中国革命影响，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反对巴西政府，认为“瓦尔加斯是一个小蒋介石”。所以中共与巴共发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巴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除巴共范围内的组织访华以外，巴西政界人士基本未曾与中国开展交流活动。与巴共不同，瓦尔加斯总统对新中国建立并未表示庆贺，巴西驻中国大使馆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先从东京处理北京和台北政府的外交事务，后来搬往台北，并派遣大使。

在第二个阶段，巴西政变后的独裁政府关闭了同中国的官方渠道，使得中国无法继续开展对巴西的民间外交活动。此后，中国只能依赖党间关系与巴西进行联系，这也恰恰是中国外交左转的时刻。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中国积极地支持巴西共产运动，并排斥与巴西发展官方关系。

尽管如此，中国对巴西的政策并非简单出于纯粹的国际革命目的。就第一个阶段来讲，巴西共产党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流，介入了两次农民起义，推动武装斗争。但中国并没有为此开展宣传工作，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此斗争。中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从国家外交利益出发，考虑到不能继续恶化中巴官方关系。

关于第二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给巴共干部提供的学习课程内容中很少有关于军事活动的实践内容，而是更注重毛泽东思想理论层面的宣传。如第五章所述，中共给拉美共运提供培训课的决定是在中苏交恶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培训有助于提高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但不一定能为巴西阶级斗争提供实际的指导作用。

2) 1954年至1959年期间和1969年至1974年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更加侧重国家外交利益，世界革命意识形态较弱。在第一个阶段，从50年中旬，中国开始把外交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并希望能争取到它们政府的外交支持。然而这些国家仅有少数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国家处在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

毛泽东相信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通过工

农统一战线推动革命，从而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和民主改造。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无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和霸权。但中共也考虑到冷战时期的国际局面而提出第三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美国为了攻击社会主义阵营，首先需要争夺中间地带。而无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怎样的社会制度，在哪一个阶级的领导下，争取这些国家有助于共同反抗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一边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运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一边试图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双重外交。对于同样属于中间地带的巴西，中国也采取这种政策，致力与巴西的民粹主义政府改善关系，谋求共同的发展。但中国同巴西政府交往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也没有保持批评的态度。同时，巴西共产党推动的阶级合作政策，主张通过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中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与中巴两国共产党发展的关系拥有同样的基础，巴共提出的方针与中国对巴西进行的民间外交政策是互相配合的。因此这段时间，中国对巴政策倾向于符合中国的外交利益。

关于第二个阶段，巴西政变以后，中巴关系进入另一个阶段。巴西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占据国家领导地位，军事独裁政权与美国开展直接合作，建立同盟关系，更加强硬地迫害巴西的共产运动。从此，中国无法像过去那样实行双重外交，而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要么不支持巴西共产运动并与独裁政府开展友好关系，要么支持巴西共产运动颠覆巴西政府。最终在中巴两国获得改善关系契机的情况下，中国考虑到国家外交利益，而选择了第一个道路，与独裁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3) 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中国开始采取更符合阶级利益的外交政策，同时古巴革命使中共对拉丁美洲的革命道路抱有较高期望。其次，1961年退出巴西共产党的人与苏共分裂而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同时掌握中国在巴西的主要民间外交活动，继而取消阶级合作的影响，不将古拉特总统作为主要盟友。此外，从中巴官方关系方面来讲，由于巴西民粹主义政府自身衰落，社会局面更为动荡，所以巴西试图推动“独立外交政策”，继而向中国政府表示好感。

因此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一边试图争取巴西政府的支持，接近巴西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一边支持巴西极左组织，帮助无产阶级推动颠覆活动。这显然带有一种矛盾的性质，但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在国家层面和党层面没有发出明显的负面作用，虽然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与巴西建交，与巴共直接同盟）。

中国同巴西的外交政策主要受到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影响：1)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变迁和；2) 中巴两国阶级斗争的发展。

1) 巴西政变之时，中国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员宋贵宝说“我们和巴西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几天后他就被关在监狱里。而在1971年，巴西商务部长与中国签完甘蔗贸易合同后说“贸易没有政党”，与宋贵宝的话如出一辙，但这次两国的贸易就可以顺利的发展，并促使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那前者为什么没能像后者一样成功

呢？这就说明贸易是“有政党”的，而中国的民间外交与“巴西的政治问题”是有关联的。

那么上述两个阶段中，有哪些不同的政治因素能够促成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在其中的地位，美国与中国、巴西之间的关系状况。中国对巴西的外交政策也离不开这个国际环境背景。巴西初步断绝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在美国与中国关系最紧张时期之一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新中国采取的外交原则对巴西的影响并不大，没有直接排斥中巴外交关系，但随着美国在朝鲜与中国作战，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抵制中国的外交势力，向民粹主义政府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巴西与美国签署了军事协议，同时于 1952 年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承认国民党政府，尽管它与台湾没有任何贸易利益关系。

随后中国推动的民间外交促使中国在巴西的影响有所提高。巴西同中国进行的贸易与同台湾进行的贸易相比，能够获得更多利益，尤其古拉特副总统访华以后，中巴官方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这尚未足以进一步加深中国同巴西的关系，中国也未能获取巴西政府的外交支持。巴西愿意同中国进行贸易，但贸易交流不足以保证成功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巴西在和中国建交方面依然缺少足够的政治动力。

民粹主义政府提倡独立外交政策，但没能摆脱巴西对美国的服从地位。美国对巴西的影响力一直都非常重要，巴西往往依赖于美国的外资，甚至希望从美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六十年代初，民粹主义政府开始需求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但每当巴西受到美国的压力就会立即妥协，与中国减少联系，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巴关系难以发展。

从其他拉美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来看，也可以发现中国外交政策的限制：直到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与古巴和智利两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前者在 1960 年 9 月与中国建交，后者在差不多十年以后（1970 年 10 月）与中国建交。在这两次建交之前，中国与两个国家进行的民间外交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效地争取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支持，^①但并不足以决定两国的政治接近。只有在两个国家政府主动在国际舞台上脱离美国带头的资本主义阵营，才有

① 关于古巴的民间外交，1959 年 4 月，中国和古巴承诺新华社在哈瓦那建立分社，同年 8 月和 10 月，古巴的妇女代表团、人民社会党代表团和古巴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表团，相继访问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党和 5 月 13 日革命组织都支持古巴革命。可见：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83 页）。1959 年 12 月中古两国签订了贸易合同，而 1960 年 7 月又签署了为期五年的贸易和支付协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以及文化合作协定，规定中国将每年向古巴购买五十吨食糖，古巴向中国购买大米和其他十种商品（可见：《人民日报》1960 年 7 月 25 日）。1960 年 9 月 2 日，在哈瓦那参加人民大会的卡斯特罗宣告，古巴有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断绝了同台湾的美国傀儡政府的外交关系（可见：Declarations of Havana（哈瓦那宣言），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62）。最终，中国与古巴在 1960 年 9 月建立了外交关系。关于中国和智利的民间外交，五十年代初，两国在智利诗人聂鲁达和智利画家万徒勒里的配合与支持下，开始了较为丰富的民间交流。智利是第一个成立对华友好协会的拉美国家。该协会在 1952 年 10 月建立，从此两国关系不再受到像中巴关系一样巨大的冲击，反而有较好的进展。1970 年，左派领袖当选智利总统，他上台之前就多次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是在 1954 年，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访华之前他就已在智利被推选为智中文化协会会长（可见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6 页）。最终，在 1970 年 10 月，中国与智利建立了外交关系。

机会建交。

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战略呈现出线性发展趋势，希望从文化和贸易层面的交往逐渐发展为政治同盟，不顾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中国不同，忽视了它们服从美国的因素。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加强，但这并不能减轻它们对美国的依附，仅能有限地促进两国关系。因此，中国对巴西的民间外交政策本身不能够促成两国建交。中国高估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同盟及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愿，同样也没看透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限制，即阶级力量很微弱，并与外国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巴西遭受政变以后，军事独裁政府奉行更加倾向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六十年代末中巴关系开始不断改善，又像六十年代初一样推进两国贸易发展、增加两国的官方交流与民间交往、加深两国的互相了解等，双方关系渐入佳境。

六十年代初的古拉特总统和六十年代末的盖泽尔总统虽然有诸多不同，但他们都有一定的动力与中国进行文化和贸易层面的联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政权下，巴西多多少少与美国有依附性的关系，所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能否从民间交往发展到政治配合和外交支持，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取决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状况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中美关系调整了以后，中国能够对巴西实行更为优惠的外交政策。从此中国提高了在拉美国家中的地位，许多拉美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巴西也一样，军事独裁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并开始走上承认中国的道路。

2) 从新中国的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对巴西共产运动的支持，中巴共产党的接触频率也逐步地提高。直到中苏分裂期间，中国与巴西共产运动建立了直接密切的联系。而从六十年代中旬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对外关系政策方案，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向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提出了一条明确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同巴西共产党的关系曾对中巴官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时有补充作用，有时产生矛盾（前文所提到过），但从来没有能够促成中巴两国的政治同盟。这是因为共产党代表的阶级与巴西统治阶级的关系是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敌对关系。因为巴西内部阶级自身的矛盾，该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很保守，这一点在许多事实上都有所体现。比如 1953 年，巴西同台湾政府建交并派驻大使、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在联合国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选举中，巴西都没有支持中国。其次，巴西是世界上第 102 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时间比较晚。

巴西政界担心中巴关系的改善会使巴西社会付出巨大代价，激化巴西阶级矛盾。所以中共越试图与巴共加深关系，巴西政府越感到排斥中国。最终，阿拉瓜亚游击队与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想与巴西建交的中国只能牺牲其与巴西共

产运动的关系，向巴西政府表明了中巴建交不会给独裁政府带来政治风险。

从 1949 年直到中巴建交，中国结束了其对巴西开展的双重外交，最终选择了符合国家外交利益的外交政策，确立了中巴正式外交关系，放弃了与巴西共产运动的联系。

参考文献

档案资料

Superior Tribunal Militar - Procuradoria Geral (巴西军事最高法院—委托书)。

Divisão de Informações do Departamento de Segurança Pública do Estado da Guanabara - Departamento de Ordem Polítca e Social (瓜纳巴拉州公安部, 信息部门)。

Departamento de Relações Exteriores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州对外部门档案)。

Arquivo históico do Ministério de Relações Exteriores, Brasília (外交部档案馆, 巴西利亚)。

Arquivo históico do Ministério de Relações Exteriores, Rio de Janeiro (外交部档案馆, 里约热内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内部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外部参考资料。

报纸与杂志

A Classe Operária

Correio da Manhã (RJ)

Diário de Notícias

Gazeta do Povo

Folha de São Paulo

Jornal do Brasil

Jornal o Globo

Peking Review

Problemas

人民日报

新华社

记录片与访谈

- [1]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get/wiNM5-M/edgard_na_china_1_mp3_wav_0.html.
- [2] “Entrevista à Edgard de Almeida Martins (parte 1)”, 1990, http://www.4shared.com/mp3/s5tubB6y/edgard_na_china_2_mp3_wav.html.
- [3] “Entrevista à Elio Ramires Garc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 [4] “Entrevista à Dynéas Fernandes Aguiar”,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is, 2014.

- [5] “Entrevista à Michéas Gomes de Almeida (Zezinho do Araguaia)”, *Repressão e Direito à Resistência - Os Comunistas na Luta Contra a Ditadura (1964-1985)*,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Fundação Maurício Graboys, 2014.
- [6] João Saldanha, *GloboNews* [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O5molKgeo>.
- [7] Marcomini, Paulo, “Um Homem (in) Comum: a Vida de Paulo”, 11 de setembro de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vkCkpxhmbo>.
- [8]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 Elio Garcia 的访谈记录。
- [9] 笔者 2016 年 2 月 3 日对 Danilo Santos (丹尼路 桑托斯) 的访谈记录。

中文文献与著作

- [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 [2] 《毛泽东年谱—1953.01/1956.09》，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3] 《毛泽东年谱—1956.10/1959.03》，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4] 《毛泽东年谱—1959.04/1961.06》，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5] 《毛泽东年谱—1961.07/1966.09》，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6] [美] E. 布拉德福德 伯恩斯 (E. Bradford Burns)、朱莉 阿 查利普 (Julie A. Charlip): 《简明拉丁美手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年 9 月。
- [7] 黄志良:《周恩来与拉丁美洲—新大陆的再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 [8] 黄志良:《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
- [9] 李明德:《中巴关系: 过去、现在与未来》，拉丁美洲研究，2001 年第，4 期。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
- [11]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2] 苏振兴主编，宋晓平、高川副主编:《中拉关系 60 年：回顾与思考》上册，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2010。
- [13]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 [14] 孙洪波:《中国对拉美民间外交：缘起、事件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网，2015 年 07 月 23 日。
- [15] 孙桂荣编著:《中国对拉丁美洲研究文献（1949-2014）》。
- [16] 孙君健:《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7] 沙丁、焦震衡、孙桂荣、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18]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19] 徐海荣、仇华飞:《列宁与毛泽东外交思想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 [20] 王翠文:《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期，2011 年。
- [21] 王玉贵:《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国共产党为视角》，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
- [22] 王唯真、宗道一:《1964 年：巴西大牢里的中国“红星”》，党史博览，2006 年。
- [23] 王勇:《20 世纪 60 年代巴西军政府制造的一起反华闹剧》，党史纵览，2006 年。

- [24] [美]维尔纳·贝尔(Werner Baer):《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
- [25] [美]威廉·E·拉特利夫:《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1959-1976)——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 [26] [巴西]雅尼丝·伊利克:《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 [27]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8] 郑志:《九颗红心向祖国——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 [2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24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62年9月27日。
- [30]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0年。
- [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件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 [33] 周志伟:《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 [34] 朱祥忠:《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记》,党史纵横,2007年,第2期。

外文文献与著作

- [1] Aguiar, Dyn áas, “Guerra Popular -- caminh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 <http://www.documentosrevelados.com.br>.
- [2] Amazonas, Jo ão, *O Revisionismo Chin ês de Mao Zedong*,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1981.
- [3] Alba, Victor, “The Chinese in Latin Ame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 March, 1961.
- [4] Amado, Andr é Mattoso M., “O Reconhecimento Diplom ático da Rep 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Minist ério das Rela ções Exteriores, Instituto Rio Branco, VIII Curso de Altos Estudos, 1984.
- [5] Azevedo, Carlos, *Jornal Movimento: Uma Reportagem*. Belo Horizonte: Editora Manifesto, 2011.
- [6] Bertolino, Osvaldo, *Pedro Pomar: Ideias e Batalhas*, S 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3.
- [7] Bertolino, Osvaldo, “Jo ão Saldanha: O Futebol e O Jogo da Vida”, Centro de Mem ória Sindical, 2014
- [8] Bueno, Carlos Antonio. B., “O Brasil e o Extremo Oriente”, Confer ência pronunciada na 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 Biblioteca da 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 6 de julho de 1973.
- [9] Buonicore, Augusto, *Meu Verbo é Lutar – A Vida e o Pensamento de Jo ão Amazonas*, S 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 [10] Buonicore, Augusto C., “Cap íulos da Hist ória da A ção Popular (2 ª Parte)”, Fundação Mauricio Graboys, 12 de setembro de 2014.
- [11] Buonicore, Augusto C., “Tributo a Jo ão Amazonas (1912-2002) - Um Comunista Brasileiro”, Portal Vermelho, <http://www.vermelho.org.br/noticia/172223-1>, 1 de janeiro de 2012.
- [12] “Com ércio Exterior do Brasil - Por Pa íses, Segundo as Mercadorias – 1960”, Minist ério da Fazenda; Servi ço de Estat ística Econ ômica e Financeira, 1960.

- [13] “Comércio Exterior do Brasil - Por Países, Segundo as Mercadorias – 1961”, Ministério da Fazenda; Serviço de Estatística Econômica e Financeira, 1961.
- [14] Demier, Felipe, “A Lei do Desenvolvimento Desigual e Combinado de León Trotsky e a Intelectualidade Brasileira: Breves Comentários Sobre uma Relação Pouco Conhecida”, Centro de Estudos Marxistas, Universidade de Campinas, 2015.
- [15] Esteves, Carlos L. S., “Nas Trincheiras: Luta Pela Terra dos Posseiros de Formoso e Trombas(1948-1964) - Uma Resistência Ampliada”. Programa de Pós-Graduação em História - 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 2007.
- [16] Fan, Xing, “A Tradução de Jorge Amado na China”, Universidade de Campinas, 2009.
- [17] Fausto, Boris, História do Brasil,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12.
- [18] Fernandes, Florestan, *Sociedade de Classes e Subdesenvolvimento*, Rio de Janeiro: Editora Zahar, 1968.
- [19] Figueiras, Otto, *Revolucionários Sem Rosto: Uma História da Ação Popular – (Vol. I) Primeiros Tempos*. Instituto Caio Prado Junior, 2014.
- [20] Guedes, Ciga; Melo, M. F., O Caso dos Nove Chineses - O Escândalo Internacional que Transformou Vítimas da Ditadura Militar Brasileira em Heróis da Ditadura de Mao Tsétung, Editora Objetiva, 2014.
- [21] Halperin, Ernest, “Peking and Latin American Communists”, *The China Quarterly*, Jan., 1967.
- [22] Magalhães, Mario, *Marighella - O Guerrilheiro que Incendiou o Mund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 [23]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oist Era and its Lessons for Today”, MLM Revolutionary Study Group in the U.S., Jan., 2007.
- [24] Neves, Marcos E. “Che é Maduraíra”. *Revista Trip*, 8 de junho de 2010.
- [25] Monteiro, Adalberto, *PCdoB: 90 Years in Defense of Brazil,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São Paulo: Editora Anita Garibaldi, 2012.
- [26] Oliveira, Pedro de, “João Amazonas”, Biblioteca Digital da Câmara dos Deputados, Centro de Documentação e Informação, 2011.
- [27] Paulon, A. C., “Entre o Rosário e as Armas: A Ação Popular e a Questão da Luta Armada no Brasil (1965-1968)”. Londrina: ANPUH – XXIII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5.
- [28] Peralva, Osvaldo, “O Retrato”, Centro Edelstein de Pesquisas Sociais, 1960.
- [29] Pinheiro, Letícia, “Restabelecimento de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com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 Uma Análise do Processo de Tomada de Decisão”, Rio de Janeiro: *Estudos Históricos*, Vol. 6, No. 12, 1993.
- [30] Priori, Ângelo, “A Revolta Camponesa de Porecatu”, Fortaleza: ANPUH – XXV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2009.
- [31] “Relatório do CC/PCdoB sobre contatos mantidos na Albânia e China (1972-1973?)”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有关巴共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 *Os Arquivos Secretos da Guerrilha do Araguaia – 10 Documentos d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PCdoB*, São Paulo: Cópia de documento apreendido no aparelho do PCdoB, dezembro de 1976.
- [32] Ribeiro, Jaime L. F., “Entre a China e o Brasil: O Pensamento Maoísta e Revolução Chinesa no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na Década de 1950”, Fortaleza: ANPUH, Anais do XXV Simpósio Nacional de História – História e Ética, 2009.

- [33] Rothwell, D. M., *Transpacific Revolutionaries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R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3.
- [34] Silva, T. A. D., “Ala Vermelha: Revolução, Autocrática e Repressão Judicial no Estado de São Paulo (1967-1974)”, Doutorado em Históri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2006.
- [35] Sodré Nelson W., *Formação Histórica do Brasil*, Editora Bertrand Brasil CA., 1987.
- [36] Studart, Carlos H., “Em Algum Lugar das Selvas Amazônicas: As Memórias dos Guerrilheiros do Araguaia (1966-1974)”. Tese de Doutorado, Orientadora: Dra. Cléria Botelho da Cost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 2013.
- [37] Ross, Robert S., Jiang, Changbin,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8] Tsai, T.C., *China's New Diplomacy: Interpreting its Connotation and Tendency*, Taipei: Wunan Books, 2008.
- [39] Tung, Chien Tsai; Liu, Tony T. T.,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Kavalski, Emilian (Editor),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Ashgate, 2012.
- [40] Vargas, Otto, *Ha Muerto El Comunismo?*, Editora Agora, 1990.
- [41] Vastconcelos, José A. J., *Daqing – Um Relato da Visita de Amarílio de Oliveira Vasconcelos*, Inverta, 2016.
- [42] Vilarinho, Carlos, “Quem Derrubou João Saldanha”, *Livrosdefutebol.com*, 2010.
- [43] Vizontini, Paulo F.,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o Brasil, de Vargas a Lula*; Editora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08.
- [44] Pomar, Wladimir, *Pedro Pomar – Uma Vida em Vermelho*, Fundação Perseu Abramo, 2013.
- [45] Zachariadhes, Grimaldo C., “Ditadura militar na Bahia: Novos Olhares, Novos Objetos, Novos Horizontes”, Salvador: 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 2009.

致谢

首先感谢王元周老师一直非常用心地指导我的硕士论文，王老师不断的给予本文的内容和结构改善的建议，并推荐给我很多相关档案的史料。王老师还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在中国的生活。

感谢在北京大学给我上过课的老师，牛大勇老师，大大帮助我了解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董经胜老师，同样帮助我了解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还要感谢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老师，让我向他请教各种关于中巴关系的问题。董经胜老师和周志伟老师也一样为我提供了很多与本文相关的史料。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虽然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却好像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一样。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葡语系老师田静以及北大历史系的同学蔡佳宏，帮助我修改了本文的许多语言错误。

感谢和我同一个导师的其他同学们，他们帮助我解决了学术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 2014 年入学的同学们，和我一起经历了这段美好的求学之路。

感谢我在中国的所有朋友们，尤其是在两年时间里和我一起住的室友 Gabriel，以及其他和我一起在中国愉快生活的兄弟。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2017年6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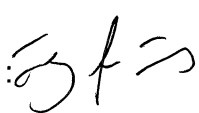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必须装订在提交学校图书馆的印刷本)

本人完全了解北京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 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
- 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
-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 因某种特殊原因需要延迟发布学位论文电子版，授权学校☐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在校园网上全文发布。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2017年6月5日

